

國際廣播

書名： 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The Limits of the Limitless  
Medium

作者： Donald R. Browne

出版： New York: Praeger, 1982.

- 第一章 國際廣播的過程
- 第二章 國際廣播的成長
- 第三章 二次世界大戰
- 第四章 美國之音
- 第五章 美國其他的廣播事業
- 第六章 英國廣播公司的國際廣播——海外服務的模範
- 第七章 其他的西方廣播
- 第八章 莫斯科電台以及其他的蘇俄廣播
- 第九章 其他共產國家的國際廣播
- 第十章 第三世界國際廣播
- 第十一章 信仰之音
- 第十二章 聽眾調查——誰在收聽？我們爲何得知？
- 第十三章 回顧與前瞻

## 第一章 國際廣播的過程

莊正安

由於無線電的發明，人類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頁從此展開。

一九〇一年，一項經由英國傳送訊息至加拿大的實驗，成爲首次的國際廣播。雖然當時只能由一人接收，且爲電碼形式，但是却已經生動的刻劃出無線電波能將訊息傳遍全球的威力。

從此，有關無線電的研究，便快速的進行著，聲音和音樂可以藉著無線電波傳送到遠方，並且被較多人同時收聽。但是另一方面，却遲至二十年後，才有國家嘗試使用廣播，來和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溝通。並爲了這個目的，設立持久性的廣播電台。儘管如此，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人物，如德國的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談到國際廣播時，已將之形容爲一個「威力無比的媒介」，把國際廣播看成是國際外交、宣傳，乃至威脅逼迫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

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和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廣播以迅如流星般的速度成長著。戰後，雖然有短暫的停頓，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再次呈現了巨幅的成長。至於過去十年間，這種成長則平穩的持續著。這似乎顯示了世界各國並無意放棄國際廣播。有些國家每年花費千百萬元發展國際廣播；而另一些國家，則以相同的代價試圖阻止國內人民收聽國際廣播。因此，國際廣播所受的限制，較之五十年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相對的，它却仍具有威力無比的特質；只要有足夠

的電力，它能夠到達世界任何角落，它可以和識字或不識字的人互相溝通，它更可以動人的聲音發揮說服的威力。

國際廣播的成長，不僅快速同時極爲分歧。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國際廣播已廣爲各國政府、宗教團體、廣告商、傳播業者甚至教育家所使用。今天，這些分歧的情形同樣存在，且隨著更多新電台的成立有與日俱增的趨勢。在一個電視愈來愈受重視的時代，國際廣播似乎仍扮演著國際交流的一個重要角色。

在以後各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各個國際廣播電台的目標有多麼的不同，必然有某些共通之處：它們必須製作或取得適合本身用途的節目，必須選擇最佳的廣播途徑，必須在國際規範架構中運作（雖然這個架構可能相當的寬鬆），必須籌措經費，必須認清廣播中所遭受不可避免的限製，和未來可能發展。本章將以一個全面性的角度來討論上述各點，期能提供有志從事國際廣播者的參考。

在進行討論前，有兩個名詞須先加以界定：其一是「國際廣播」，許多人使用這個名詞時，他們所指的是凡超越國界之廣播便屬之；本文採另一較狹窄定義，只指那些具有多種企圖（*multi-posed*）並超越國界的廣播而言。另一界定名詞是所謂「電台」，本文稱國際廣播組織爲電台，即使其中可能包含許多不同（但互有關聯）以多種語言從事的廣播服務。

## 第一節 廣播節目與廣播人員

國際廣播電台以不同語言所提供的服務，少則二、三種，多則甚至超過六十種以上，而且每天播出時間也自十至一百小時不等，節目的準備成爲一個很大的負擔。有些電台爲了減輕負擔，便大量使用國內廣播節目；另外有些電台，則將所製作的節目，每天重覆的播出；還有些電台大部份時間，所播出的節目則是早已灌錄好的音樂。以下我們將就節目型態和風格、節目製作、語言服務和廣播者本身幾個方面分別討論。

### 一、型態和風格

國際廣播電台大部份播出的，都是屬於新聞性節目。但節目的表現也有種種不同的風貌，如新聞報導、評論、訪問、座談等方式。新聞性節目的重點自然是在報導本國及世界所發生的事件，但很多新聞性節目，也試圖就本國的經濟、科學、教育、宗教和文化生活，各方面來加以描繪介紹。在這種情形下，節目內容可能又融合了戲劇、音樂、宗教活動和體育等方面的報導。

大多數國際廣播電台，較國內電台花費更多努力，來鼓勵聽衆的回饋：音樂點播、猜謎遊戲、聽衆信箱，都是引起聽衆反應的方法。從他們的回饋，使廣播者確知有那些聽衆在收聽節目；也更清楚廣播效果的好壞，並獲得聽衆對節目具體的意見。

電台間的節目型態雖各不相同，但幾乎每個電台都會提供新聞報導、音樂和聽眾信箱等節目；同時，還會提供有關本國的文化資料、語言教學或重要新聞提要。有些電台還提供了有關貿易、工業和旅遊的特別節目，以「推銷」國內產品並吸引遊客前來觀光。

假如一個聽眾，能夠同時收聽大部份的國際廣播節目，他將會很驚訝的發現，這些節目的風格都非常「拘泥形式」（即很正式 *formality*）。熟悉英、美國內電台節目主持人輕鬆活潑，不拘形式的新聞播報的聽眾，會覺得國際廣播的播報語調，顯得特別穩重堅定，有時更不免因過份正式而流於誇張。或許這是因為電台的新聞稿和播報方式，都得先經政府同意所造成。

許多大規模的國際廣播電台，僱用其他國家人民作撰稿和播報的工作，因為他們可以流利正確的說、寫那些國家的語言。但是其中有些人曾經在自己國內從事過廣播工作，因此也把以往舊習帶到現在工作的電台。這些舊習包含正式型態、說寫複雜的句型結構和字彙等，使得節目「拘泥形式」的風格不易改變。

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有些電台開始試著採取較輕鬆（非正式）的播報方式，如美國之音（VOA）在一九六三年開播的「早餐時間」（*Breakfast Show*）：一種混合了簡短新聞報導、特寫、訪問和音樂的節目，並且有輕鬆活潑的男女主持人。有些資料顯示，這類節目贏得許多聽眾的讚賞，雖然另外還是有人偏愛較正式而且嚴謹的節目型態。

## 二、節目製作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節目製作的過程，是因為可以幫助解釋爲什麼電台播報的新聞，常會有錯誤報導或理解上的困難等情況發生。

不同電台有其不同的新聞處理方式，但大多數都是透過一個中央新聞室（central news room）來準備新聞並翻譯成不同的語言。有的電台甚至連播出內容和特寫都是由中央新聞室統一預備，並且嚴格要求播出時不得任意增減；另外，則有一些電台允許對中央新聞室準備的內容，有較大的取捨彈性，甚至允許有不同方式的創作和選擇自由。

少數電台，如著名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小心的建立了中央新聞室，和外語服務部門間的緊密工作聯繫，因此一旦有了爭執困難，便可立即協調討論，使問題順利解決。但是很多的國際廣播電台，都忽視了這方面應有的努力。

新聞報導必須趕上时效，假使製作人無法適當的執行工作，結果便可能使得播出遭受延誤，或以匆促草率的態度來準備資料和翻譯。而由於很少電台能對所播出節目經常且有系統的檢查，使得錯誤不易查覺。這些原因，解釋了爲什麼有許多電台，似乎從未瞭解由於他們在播報內容上的錯誤，以及型態上的過份拘泥，使得他們因而失去許多聽衆。

### 三、語言服務

多數國際廣播電台，都以二種以上的語言，從事廣播服務工作。儘管世上有千百種以上的語言，國際廣播電台使用的語言，却不超過一百種，其選擇不外乎本國及世界主要語言。

但是爲什麼德國之音（Deutsche Wille）會選擇播出伊朗語言節目？莫斯科廣播電台（Radio Moscow）會爲南美印地安人播出 Quechua 語節目？回顧語言服務節目的早期歷史，將能回答這些問題。一個國家對國際危機的反應，通常採取向危機地區或其鄰近的人民直接的國際廣播。而這項語言的廣播，很可能會招致敵對國家同時展開相同語言廣播，以爲抗衡。兩國間重新恢復邦交，也可能產生相同反應，只是刪除節目中敵對的內容。希望加強兩國貿易關係，也可能產生新的語言服務。政治力量龐大的移民社區，也可能促成新語言服務的展開。

有時，透過駐外使館的建議，也會成立新的語言節目。一項新的語言服務，可能正象徵了兩國外交、貿易、文化各方面關係的加強，並可藉此提高使館信譽。

儘管發展一項新的語言服務有很好的理由，可是有時也不免會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如缺乏合適人選便是一項最主要的因素。雖然可以自其他國家招攬人才，但花費昂貴，而且在處理有關意識型態較抽象的資料時，可能並不合適。理想上，他們最好是播出國家國民，才能確保廣播內容符合國家政策。但是在許多國家中，像這種精通他國語言的人才並不多。況且，這少數人才通常會優先考慮從事外交或貿易工作，因爲可以獲得較高的報酬和利益。

另外一個因素便是時間。成立一項新的語言服務，通常需要花費數月的時間準備，如 BBC 在一九八一年爲了對阿富汗展開廣播，足足準備了半年。因此，如果新的語言服務只是對短暫危機的反應，便沒有發展的必要。有時，經費也是新的語言節目成立或取銷的原因。

#### 四、國際廣播人員和聽衆

雖然我們常把國際廣播看成是一個機構，但我們也不應忽略了其成員，因為舉凡資料收集、撰稿、播報、錄音、器材操作、研究指導等工作，都要藉助他們來完成。在廣播政策上，這些人員很少能有影響力，但是無疑的他們却影響到用字遣詞的正確、翻譯的精確、播音的清晰、氣氛的塑造（溫暖、嚴肅等），並決定了訊息的說服價值。

曾有段時期，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和冷戰前期，國際廣播人員被視爲「宣傳戰士」（*pro-poganda warriors*）。然而，現今符合這項稱呼者已不多見。這是因爲大多數國際廣播人員所深感興趣的，是和其他地方的人們進行傳播的過程及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他們雖然對國際關係也有深厚的興趣，可是他們也看見自己常不免陷於意識衝突的困難中，並且沒有足夠時間，容許他們來精心策劃宣傳或潤飾每個字句，以期能儘量說服各種聽衆。

此外，大多數國際廣播人員，對於過份強調意識型態的觀念，常抱持著略帶嘲諷的態度；因此，他們並不適宜扮演狂熱意識主義者的角色。第三個理由是國際廣播人員深知儘管世上充斥宣傳，許多聽衆仍依照自己的興趣、需求來收聽，而非對廣播內容照單全收。

令人驚訝的一個現象，是國際廣播人員中很少有人能夠對他們廣播的對象有清楚具體的看法。少數人只能描述某些特別的聽衆是廣播者在廣播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另一些人則不僅對聽衆沒有認識，甚至以爲「世上聽衆，大致都很類似」。

有兩類國際廣播人員，似乎能夠對他們的聽衆有較具體的看法：一類是曾以特派員、外交人員、學生或其他身分在國外居留相當一段時間的人；另一類則是生在外國，且長在外國的人。前者通常成爲電台語言節目的主持人，後者則從事撰稿和播音的工作。而即使是他們對聽衆所持的印象，也不外乎是得自他們所熟悉的人們或來自聽衆信函。假如他們社交圈子夠廣濶，聽衆來信也涵蓋各個階層，那麼他們對聽衆的看法可能相當正確，只可惜！事實上他們看法的基礎，僅僅限於十數年前的印象和數量不多的信函而已。

這兩類人員另外還有一個潛伏的問題：他們的忠誠可能會傾向所廣播的國家，特別是一個在他國誕生並成爲該國國民者，當他成爲另一國國民時，常會對出生地國家有一份誠摯深厚的感情和忠誠。

因此，最佳廣播人員應該對於電台所代表的組織及國家有堅定不移的忠誠；對別的國家和文，基於本身旅居國外經驗，有敏銳而深刻的瞭解；對於其廣播對象不論在生活、心理各方面都能有具體鮮明的認識；同時還能在撰稿、播報、製作、研究各方面有優越技巧。

多數廣播人員，似乎對其聽衆有下列一般的假設：聽衆對於播報國家有相當的興趣和好奇，他們在收聽廣播時的態度是專注嚴肅的，他們的教育和收入高出一般水準，並且他們會收聽一個以上的國際廣播節目。前二個假設可能不太適合國際商業電台，但大體說來，這些假設倒可適用於大部份國際廣播節目的參考。

根據這些假設，大多數國際廣播電台節目，因爲顯得極爲正式，並且有相當複雜的句式結構

。如果廣播主要是針對意見領袖，寄望他們在收聽後將所收聽的觀感和資料，傳播給其他人，這種正式型態可以發揮效力；但如果廣播主要目標是直接針對廣大聽眾，便可能無法收效。對心存好奇聽眾而言，廣播方式的呆板，將使他們失去收聽興趣；對心存偏見敵意的聽眾，可能在收聽廣播後更加肯定他們自己的看法和偏見。

大多數國際廣播人員，都試圖使他們的節目具有權威性和良好的聲譽，同時不摻雜太多意見，能滿足不同興趣，並建立一種友善而理性的氣氛。有不少節目，混合這些要素獲致滿意成績，但究竟什麼是最佳混合方式，迄無定論。總之，廣播人員是永遠無法使所有聽眾同感滿意的。

## 第二節 訊息傳遞

### 一、訊息傳遞和轉播

當我們一想到廣播時，大多數人的想法，可能就是一個訊息從某一特定方位，直接傳遞至其聽眾。這種廣播可稱之為直接廣播（direct broadcasts）。另外有些國際廣播電台，也使用轉播站（relay station）來加強訊號範圍，雖然花費頗鉅，但大的國際廣播電台如BBC，VOA等都有採用。

這種訊息的轉播，有下列三種方式混合應用，而這三種方式都有相同的限制——無法由廣播電台自行控制廣播資料。

一、重播轉收訊息 (retransmission of relayed signals)：國際廣播電台對某特定國播出的節目，由該國電台接收後作立即播出。這些轉播節目大多是新聞報導，因此要爭取時效。而當地電台之所以願意重播這些轉收訊息，原因是他們無法適時提供自製新聞報導。

類似這種安排有賴轉播國家或電台的善意，否則雙方關係變質時，即便在最迫切需要消息時刻，轉播也可能被迫中止，因此，多數電台並不常使用這種方法。

二、轉播事先錄製好的資料 (retransmission of pre-recorded materials and scripts)：許多國際廣播電台將節目錄製在唱片和錄音帶上，供其他國家國內電台播放。這些事先錄製的節目，有的是已在製作電台播出過的節目，另外有些節目却是應其他國家電台要求所特別錄製的。

唱片和錄音帶以郵寄傳遞，內容大多數是音樂性節目或軟性特寫節目。一旦郵寄出去，這些資料命運如何就非錄製電台所能掌握預卜了。

三、監聽 (monitoring services)：監聽的確是另一種轉播方式。有些國際廣播之所以能被國內聽眾收聽，便是透過監聽之報導，而非直接廣播的效果。幾乎世上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有監聽系統之設置，他們主要任務便是聽取其他國家國內和國際性廣播中，可能包含的政治意義。

全球有數以萬計的廣播電台，每天日夜不停的以數十種語言播出。因此，沒有任何監聽系統能完全涵蓋所有電台播出的節目。每天的監聽報告，目的是為提供外交政策之參考，所以凡是新

聞性廣播諸如新聞報導、評論、訪問和主要演講或宣告，都是監聽的重心。同時，監聽工作也各有其依循準則。因此，他們的報告都是經過再三斟酌後才提出，雖涵蓋相當範圍，却也漏失許多評論性資料。

世界政局中佔據重要地位國家的電台，代表革命運動或政治上反對團體的電台，較其他電台有更多機會被選為監聽對象，對許多秘密電台而言，這成爲他們傳遞消息至外界的有效途徑。另外，國際或國內廣播電台有時也使用監聽所得資料，作爲他們節目的重要來源。

## 二、頻率範圍和科技上的控制

一、低頻 (Low frequency, 包含長波, 30 ~ 300 KHZ) : 優點是不受白天或夜晚影響，訊息可傳送至相等距離，但需要強大的輸送電力。多數發射站 (transmitters) 的電力自五百、一千或二千KW不等，頻率很少，在國際廣播中並不重要。

二、中頻 (Medium Frequency, 包含中波, 300 ~ 3000 KHZ) : 廣爲國內廣播電台所使用，甚至國際廣播電台也有中波節目。時間是必須考慮因素，以相同電力發射訊息，夜晚距離比白天來得遠，這是國際廣播電台較少採用中頻原因。此外，由於國內電台大量使用之故，中波已呈飽和狀態，沒有剩餘波段可供國際廣播電台使用。

三、高頻 (High Frequency, 包含短波, 3000 ~ 30000 KHZ) : 爲大部份國際廣播電台所使用的頻率。藉著適當大氣層和電波，訊息可以傳至很遠距離，且不受白天或夜晚的影響。但是

訊息遭受干擾却成了短波的主要問題，這種情形使短波較長波、中波和調頻不適於播放音樂節目。

四、超高頻 (Very High Frequency, 包含調頻, 30~300 MHz)：有效半徑很少超過 75 英哩，在國際廣播中很少使用。當調頻可以在國際廣播中使用時（如東西德間），那是因為調頻的音質優良並相當能抗拒干擾。

五、衛星傳播 (Satellite Transmission)：雖和電視有較密切關係，但在廣播中亦佔有一席之地。英、德、荷、蘇、美等國，已使用衛星來直接傳遞廣播訊息，至他們各自的海外轉播站。衛星傳播頻率自 3000~30000 MHz，它的訊息可以由中波或短波來接收。

六、干擾 (Jamming)：正當有許多國家渴望與其他國家分享彼此的觀點時，另外却有許多國家積極的使用各種方式，阻止別的國家的觀點影響其民衆。干擾的歷史可遠溯至一九二三年，德國的一家電台，播出反對法國佔領魯耳地區 (Ruhr) 節目後，法國電台以相同頻率播出法語節目和噪音干擾德國電台廣播。這個事例導出日後層出不窮的干擾問題。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和二次大戰後的冷戰，至今干擾現象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日趨頻繁。

蘇俄和東歐共產國家，常不遺餘力的對重要國際廣播電台進行干擾。一九五三年，自由廣播電台 (Radio Liberty) 開播以後，蘇俄便沒有一天停止對它的干擾。蘇俄並且還干擾 BBC, VOA, 德國之音 (Deutsche Welle)；一九八一年夏天的波蘭危機，使得干擾達到空前強烈地步。但也有些東歐國家放棄干擾作法，如羅馬尼亞 (Romania) 於一九六三年、匈牙利 (Hungary)

於一九六四年，他們發現干擾作法不僅耗費太高，又不十分有效，同時愈干擾愈使人民執意收聽。至於非共產集團國家，也有施行干擾事例。但大體上，時間較爲短暫，且常是爲某些特殊事例或危機所引起。

干擾簡單的說，就是對外來廣播訊息和它相同的頻率播出節目或噪音，來影響其訊號接收，並干擾其音質。因此要有效封鎖外來音訊需一系列的干擾站（jammers），並要有強大電力以發射干擾電波。據估計，蘇俄每年在干擾站上的花費高達數十億美元。

針對如何克服干擾，有些對策已經被發展出來，如「飽和廣播」（Saturation Broadcasting），那是一種集中全部力量，單向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強力的廣播。這種方式可以突破大部份的干擾行爲。但是實行起來並非易事，因爲其中包含了種種技術上的問題，而且也剝奪了其他地區聽衆的收聽權益；但是它却也生動的表達了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強烈的不滿。

另一種避免干擾的方法，是採取「緊鄰式」（cuddle）的廣播，就是採用一個和目標國內廣播電台相近的頻率，如此一來，假設目標國試圖干擾，他們也同時干擾本國電台的播出。不過，大多數國家爲了達到干擾的目的，即使本國電台受到干擾也在所不惜，因此這個方法並不見得很有效。另外隨時變更播出頻率，也是避開干擾的方法，但是這樣勢必使得聽衆無所適從，難以收聽。

儘管干擾並不見得有效，聯合國會議中，也曾被多國加以譴責，干擾的命運尙未終結，似乎仍將持續的被使用著。

七、其它科技型式的控制（other technological forms of control）：干擾作法既不十分有效，花費又高，政府必然會尋求其他方法，限制人民接近不當國際廣播。最通常的方法，就是管制收音機使無法接收國外廣播，納粹德國曾以供應人民廉價收音機來達到這個目的。價格低廉的原因是這些收音機僅能收聽一、兩個德國本國電台廣播節目。

二次大戰前，蘇俄發展有線收音機（Wired Radio）來阻止人們收聽國際廣播。最近，有些國家積極發展調頻廣播系統，其原因固然一方面是調頻廣播的音質優美，且國內中波頻率已達飽和，另一方面也含有藉此吸引人們不去收聽國際廣播的目的。

### 第三節 國際廣播規範

雖然經過不斷的努力，國際廣播至今仍缺乏秩序和規律。要建立國際廣播規範，牽涉到科技和節目這兩個相關聯却又各自分立的方面，要使他們納入軌道似仍遙不可及。

#### 一、科技方面

這方面的基本問題，在於可用頻率太少，却有太多國家積極的來爭取，頻率的分配因而形成一大紛爭。自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國際廣播界人士，便常舉行區域性或國際性會議，聚集研商訊息遭受干擾和頻率過度擁擠等問題。這其中以國際電訊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

nication Union, ITU)所作的努力最有成效。

ITU 嘗試以合理而公正的態度，來安排世界各廣播電台所能使用的頻率。一度 ITU 會員同意，就他們所需使用的頻率，各國向國際頻率註冊局 (International Frequency Registration Board, IFRB) 提出申請。然而一登記下來，可使用的頻率遠不敷各國所需。IFRB 乃採取一種「先到，先服務」(first come, first served) 的「優先使用權利」(right of prior occupancy)。同時，由於無線電傳播的許多狀況無法預料，因此也兼採一種所謂「干擾」(interference) 方式，即允許一個新的廣播，使用一個已登記註冊的頻率，如果在六年內，沒有證據顯示二者相互衝突，那麼這個新廣播便可登記註冊，成為合法的頻率使用者。

IFRB 也努力發展其他方法，以減輕各種衝突現象，如實驗新的傳送和接收方法，建議遭受干擾頻率改換鄰近頻率，變更廣播時間等，這些建議有的固然奏效，但衝突仍未減少。而且愈來愈多國家無視 ITU 的協議，自行其是；蘇俄、中共等四十三國，更積極提倡不受管制的國際廣播。

另一個引起更多麻煩的是「超強電波競賽」(Superpower race)。一九五〇年代，很多國家更換他們原本才 100 KW 的電力為 200、500 甚至超過 1000 KW，使一九六一年時只有十六個電波在 200 KW 的短波發射站，到了一九八一年增至三二五個。這種競賽使得國際廣播費用日增，只要想繼續參與競賽便得不斷投入大量資金；諷刺的是參與競賽的數目却有增無減。這種趨勢使得無法負擔這筆龐大支出的國家，更加意識到他們所處的不利地位，更企盼 ITU 能糾正這項弊端。可是至今並沒有獲致顯著成功，因此，許多國家不免懷疑，國際間是否存有真正的協調精神，可以

圓滿的來解決問題。

## 二、節目方面

如果拿國際廣播規範中有關節目方面的問題來和科技方面的問題相互比較，前者無疑的較後者困難許多。試想就以內容來分，有誰能夠以客觀而具體的標準界定廣播內容究竟是真是偽，是誹謗，還是謊言，或是在鼓吹革命？許多國際性的努力，便因內容界定的困擾而告失敗。

有關廣播受到干擾問題，一九五〇年聯合國會議中，也曾提出討論過，並有多國對「干擾」作法大加譴責，共產國家則起而辯解，他們之所以這麼做，為的是保護人民心靈免受污染，就如波蘭代表所說：

每個國家都有權抵禦外來廣播的侵襲，正如同有權禁止鴉片走私，杜絕色情泛濫……。

因此，儘管VOA, BBC認為他們的廣播翔實可靠，共產國家依然故我，肆意干擾。

一九五〇年聯合國之所以會討論干擾問題，是受到一九四八年全球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影響，這個宣言第十四條款是這樣記載的：

人人都有自由表達意見之權利。這項權利包含了意見不受干擾的自由，並且得以透過任何媒體來傳遞、接收和尋求訊息，而不受有形國界之限制。

由於這次宣言提出了資訊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的觀念，遂視干擾為「非法」行爲，應加制止。

可是，「資訊自由流通」觀念，却也成爲另一個國際辯論焦點。美國自始便極力贊成資訊的自由流通不應受到限制，其原因乃是美國於一九六〇年代，已逐步發展衛星直接傳播系統的建立，自不希望遭受任何阻礙。但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深恐資訊的自由流通，再加上衛星直接傳播，將使目前已經相當嚴重的單向傳播（one-way）問題更形惡化，因而極力反對。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雖仍堅持「資訊自由流通」原則，但在第十九條款中加以補充，認爲這項原則於某些特別情形下應受限制，這些情形包括「尊重他人的權利和聲譽」，以及「爲了保障國家安全，公共利益，並維護健全道德。」一九七二年，聯合國辯論至最後提出解決方案是：

基於衛星直接傳播所可能導致的諸多問題，資訊自由流通應受到限制，國家主權應受尊重。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第三世界和共產國家，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動一項名爲「國際資訊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運動，已開始受到重視。而一九七九年，馬克布萊德委員會報告（Mac Bride Commission Report），更被認爲是未來發展計劃的一個藍圖。但是諸如有關政府限制外國特派員問題、資訊流通平衡問題和如何維護本國文化傳統，免受外來資訊侵襲破壞等複雜問題，未來似仍將繼續存在著。

#### 第四節 經費和控制

除了少數國際商業廣播電台外，大部份國際廣播電台依賴外來經費援助。有些經費來自法律特別規定，有些經費則來自國家廣播系統年度預算中的一部份，因國際廣播通常包含在國家廣播系統內。至於這些外來經費來源，則可能是國家稅收或聽眾所繳的執照費。國際宗教廣播電台的經費，則大多來自宗教團體或個人的捐獻。

經費無法自主必然產生控制問題，正如諺語所說：「不論是誰，只要付錢便是老闆。」例如國際商業電台，雖然沒有一個廣告贊助者能提供電台所需全部經費，但是電台絕不會輕易的去得罪他們。相反的，必定以娛樂節目號召聽眾來吸引廣告商支持。一個國際宗教電台也必須力求節目品質的提昇，以維持捐獻行動的持續。

更直接的控制，則是來自議會對有關年度預算的質詢審核。即使是聲名卓著的BBC、VOA也無法不受質詢便順利通過預算。但大體而言，議員們對國際廣播並沒有太多認識，因此很少直接影響到廣播政策方面。

國家領導人物，很少會直接藉經費來控制國際廣播電台；通常，他們會以較間接方式，如透過外交部長來施行控制，只是這種行爲也不多見。

由於國際廣播電台，通常是屬於國家廣播系統的一部份，因此國家廣播組織對它也能施加控制。這種控制不在政策方面，而在國際廣播電台的成長上；當預算減少，費用日增時，國際廣播電台的經費便可能遭受裁減，或是被「凍結」起來。

外交部長是否支持，有時也影響國際廣播電台分配的經費數目。因此外交部長在政府地位愈

高，電台愈不敢拂逆其指示，愈受其控制。

實際上，國際廣播電台經費真正的來源，應是一般民衆，但是這些真正的贊助者，却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BBC 曾試圖加深民衆對電台工作的認識，並希望藉此來影響國會不刪減國際廣播電台經費，可是似乎沒有跡象顯示這項作法發生了效用。

上述各種控制，可稱爲是外來的控制，至於內部控制，則操之電台的負責人員。他們對執政者的想法有敏銳的瞭解，並以之爲電台運作原則；有時這些負責人是由政府所指派，以期確保電台的廣播，符合國家政策及政府意願。因此，在多數情形裏，國際廣播電台大體上是受國家外交決策者的直接掌握控制。

## 第五節 目的

國際廣播電台因爲受到多方面的控制，自然連帶的影響了它的目的，呈現出多重面貌。以下列舉八種目的，分別介紹。

### 一、外交政策的工具

一九六七年，政治學者羅伯赫特（Robert Holt）在著作中，提到自由歐洲廣播電台（Radio Free Europe）時，稱其爲一個「非官方的（美國）外交政策工具」，並稱呼國際廣播

爲「公共外交的工具」(instrument of public diplomacy)。雖然他沒有明確界定這兩個觀念，但是已顯示了國際廣播在外交和外交政策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外交政策的形成，可分爲政策擬訂和政策執行。國際廣播主要是作爲外交政策中衆多可能的執行者之一，其餘還包括了國內報紙、電訊服務、電影、電視和展覽等。

電台如何來反映外交政策呢？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開播特別的語言節目，或增長這些節目播出時間。當國際危機或特殊事件發生時，相關國家的國際廣播電台，立即會以適當的語言，大量播出節目；而一旦危機解除，這些特別播出的語言節目，通常便回復原狀，甚至從此消失。一九六八年捷克事變，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年的伊朗、阿富汗和波蘭事件，都說明了電台反映外交政策的機能。

大量特別播出的語言節目，不僅能對目標國或其他涉及國家，明白的表示了播出國家對於危機的關切；同時，由於節目的增加，也因而吸引更多的聽衆，方便他們的收聽，對他們造成相當的影響。

國際廣播電台既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明。這些聲明可能以宣告、報導、主要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由於形式相當正式，對聽衆而言，既難懂又乏味。一九七八年，VOA嘗試自行撰寫三—四分鐘有關美國政府外交政策觀點的廣播稿，結果仍無法突破以往成規。

## 二、社會的反映

大多數廣播電台，都自認作到了反映本國社會現況的工作，有的電台在他們的廣播法中，也明白列舉這項任務。爲了達成這個目的，一些電台會重播國內的廣播節目，另一些電台，則自行製作特別節目；藝術節目通常是最慣常被使用作爲介紹社會生活的方式，其他還有有關宗教、經濟等不同的節目。許多電台也介紹了該國國民特質，如日本廣播電台（Radio Japan）製作的「億萬人中的一位」（One in a Hundred Million）。類似這樣的節目，使得播出國家顯得特別富有人情味。

但是對大多數國際廣播電台而言，他們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常是已經過高度選擇的社會，並非真正的全貌。他們很少報導本國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中頹喪、醜陋的一面，只是極力描繪社會中積極樂觀的部份，以塑造國家良好的形象。

## 三、象徵的表現

有些國際廣播電台的成立，僅只是爲了作爲國家新近獲得獨立地位的一種象徵。這些國家可能並不明瞭設立國際廣播電台的目的何在，却不惜耗費鉅資來全力發展。另外，有些國際廣播電台，雖已失去成立意義，但却仍繼續存在，其原因便是國際廣播代表一種「國際參與」（Internationally involved）的象徵。如果一個國家停止其國際廣播，便很可能意味著該國不願和其

他國家增進溝通，或是對世界輿論漠不關心。自然，沒有一個國家樂意被人如此看待。

#### 四、改變者和維持者

很少國際廣播電台會試圖說服其聽眾作完全的改變，但大多數則不免希望說服聽眾，至少部份的接受廣播內容所含的觀點、政策甚至信仰。以國際宗教電台為例，他們所廣播的訊息已捨棄往日「信者得救，不信者必致滅亡」的方式，而改採「耶穌基督是唯一救主」這一個普遍為人接受的信息。

另一方面，廣播電台也時刻致力於聽眾忠誠的維持。他們採用的方式，有時是播出一些能堅定信念的節目，有時則誦讀一段聖經的話語，有時則針對聽眾不同興趣來播出特別節目，也有播出讀者來函中對節目讚美和鼓勵的內容。

#### 五、強迫者和威脅者

早在二次大戰發生之前，國際廣播便扮演了強迫者和威脅者的角色了。這種廣播之能否發生效果，主要關鍵就在武力之是否強大，因為廣播是和武力相結合的。二次大戰初期，德軍勢如破竹的勝利，使得威脅性廣播發揮震懾人心的強大力量。但是隨著戰局逆轉，二次大戰後期，雖然威脅性廣播依舊，聽眾却不再感到恐懼。

戰後，類似廣播已不多見，大概只有秘密電台廣播（clandestine broadcasts）才會出現這

種方式的廣播，威脅敵對政府或國家領導人交出政權，否則將進行武裝顛覆。

#### 六、教育者

國際廣播電台成立的目的很少是純粹爲了教學，但是許多國際電台，都有語言教學節目的播出，聽衆可以從收聽中學習各種不同的語言，有的電台還有免費教材的贈送。

然而，這些語言課程並非單單只是一種教學節目，在節目中的對話和獨白裏，常摻雜著有意識型態的內容。

#### 七、娛樂者

國際廣播節目中，雖有相當的娛樂成分，但純粹娛樂性節目並不太多。節目中帶有娛樂成分，基本目的是爲了吸引聽衆維持收聽的興趣，進而連新聞性節目也一併收聽，或是產生對播出國家良好的印象。

音樂點播和聽衆來函是吸引人們收聽最有效的方法；另外，音樂節目和輕鬆活潑的節目主持人，也會使得電台更具有人情味，使得聽衆對電台播出節目倍感親切。

有些娛樂節目，其實也兼負了反映社會的功能，如戲劇、歌劇、猜謎等節目，主持人可透過介紹音樂和演員背景的機會，連帶的介紹了該國的種種風貌。

#### 八、商品和服務的推銷者

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已有國際商業電台的出現，至今，雖仍為數不多，却遍及世界各洲。這些電台的特色極為相似：節目中主要播出的都是流行音樂，從各地的流行音樂到世界流行的迪斯科（disco）音樂，無所不包；同時，這些電台每年的收入也都相當的可觀。

這些電台興盛的原因，是他們在廣告和節目中所提供的服務，是許多國家國內廣播所無法企及甚至短缺的，因而吸引大量聽眾並連帶的吸引大量的廣告。

有些國際廣播電台，如BBC則運用廣播推銷國家形象，希望藉此發達國內觀光事業；另有些國際電台則透過廣播介紹本國科技和新產品，以推展外銷。

總之，廣義來看，幾乎所有國際廣播，都稱得上是推銷者——或是推銷實際商品，或是推銷某種思想信仰。

### 第六節 有效國際廣播的障礙

#### 一、實體上的障礙

此處造成廣播障礙的原因包括：電台本身的設備、節目製作水準、廣播題材、播出的時間和節目的持續等方面。另外，干擾所造成的障礙，則是目前國際廣播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儘管如此

，聽衆仍有克服干擾的對策，如使用高品質的收音機、靈敏度高的接收天線、技巧的轉到適當頻率等方法，但是這些方法都需要金錢、耐心和稍許的智慧，並非人人可行。廣播者也可以幫助他的聽衆克服障礙，如以多種頻率播出節目，減緩播報速度，或將節目轉交其他國家電台播放，避免使用複雜詞句，並藉著靠近聽衆地區的轉播站播放節目，妥善設計白天和夜晚播出的節目，增加播出時間等方法，都可以帶給聽衆很大的便利。

## 二、心理上的障礙

假如我們能夠克服所有實體上的障礙，那麼是否就意味著國際廣播便可以有效的運作了呢？並不儘然，除實體障礙外，另外還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礙，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如聽衆受本身預存立場的影響，可能拒絕收聽，即或收聽，也可能曲解廣播內容。有時則是聽衆對於國際廣播沒有興趣，或是把收聽國際廣播當作一種次要活動，只有當主要工作完成後，才偶一爲之的行爲。也有的聽衆則是因爲收聽到不實報導，乃憤而停止收聽。

面對這些障礙，國際廣播者仍有克服的方法：首先，便是加強新聞的正確性，同時不試圖掩飾本身的缺點，也是克服聽衆抗拒廣播的好方法。「旁敲側擊」(side attack)方式有時也相當能夠奏效。另外，重視聽衆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現行政策，也可能相對的引起聽衆對於廣播國家的好奇，並進而開始收聽其廣播。還有塑造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世界觀念，有時也可以消除聽衆相當程度的敵意。

至於各個國際廣播電台，對於這些影響有效國際廣播的種種障礙，是否重視，是否關切，也可算是心理障礙的一種。雖然，最有效的國際廣播似乎仍遙不可及，但是却不能因而放棄了應有的努力和企盼。

## 第二章 國際廣播的成長

本世紀初期二十年間，有關無線電波傳送訊息的實驗，方興未艾。

這些實驗主要的目標，就是想突破距離的障礙，使音訊能被更有效的運用，使海上行駛船隻可以毫無困難的和陸上聯繫。

當然無可避免的，音訊發射出去後，會被其他國家接收到，雖然訊息原先用意，並非針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宣傳說服的工作。

即使，可能有類似宣傳廣播的情形出現，其效果也值得懷疑。因為大多數的訊息，仍是以電碼方式來傳遞，不可能會有太多聽眾。

直到一九二〇年以後，大多數工業國家才開始建立廣播服務。那時，連蘇聯在內，沒有一個國家創設廣播電台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海外聽眾。

第一個真正為海外聽眾服務的廣播電台，出現在一九二七年，是由荷蘭所設立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那些移居荷蘭海外殖民地的荷蘭人民。因此，節目中包含許多荷蘭國內廣播節目，以慰勉這些遊子思鄉之情。

荷蘭海外廣播服務，是國際廣播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從此，許多國家也陸續發展出相同的廣

播服務，如德國在一九二九年，法國在一九三一年，英國在一九三二年。今天，這樣的服務仍存在某些國際廣播電台中。

雖然，專為殖民地提供的廣播服務，對象是那些移居海外的僑民，但是，由於有些節目內容精彩，自然也吸引當地民衆收聽的興趣。這些聽衆的迴響，使得許多國際廣播電台改變態度，逐漸重視播放適合當地民衆收聽的節目，也因而發展出其他型態的國際廣播服務。

第二種國際廣播型態，也就在這樣情形下，展露頭角。沒有很合適的名詞來形容這種國際廣播型態，我們姑且稱之為「政治意識」(politically ideological)型態國際廣播，蘇俄為始作俑者。

一九二七年，蘇聯慶祝布爾什維克黨革命十週年紀念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許多外賓齊集莫斯科參與盛會。蘇聯廣播當局曾安排與會貴賓，各自以本國語言向自己的國家發表廣播談話。當慶祝會結束後，這項廣播也同告中止。但是這個經驗鼓舞了蘇聯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政治意識廣播電台的興趣，而終於在一九二九年，將之赴諸實行。

很快的，這個電台便以數種語言來播出節目，其中包括歐洲大部份的語言和國語 (Mandarin, Kuoyu)。早期廣播內容着重於蘇聯民俗、民歌介紹，並解釋蘇聯革命所帶來的重大成就，攻擊其他國家或意識型態的內容絕少出現。

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奪得政權後，這種情形有了迅速的改變。蘇聯攻擊納粹德國的廣播，

激起後者強烈的反應。政治意識型態的國際廣播乃成爲國際廣播中的一個主流。

義大利於一九三五年，在其阿拉伯語廣播中抨擊英國的中東政策。日本對華戰爭，也開始使用廣播戰略。英國也爲了因應義大利廣播電台的攻擊，首次以英語以外的語言——阿拉伯語開始一項新的廣播節目。無視於國聯的努力防止廣播作敵意的用途，所謂「短波之戰」(war on the short waves)如火如荼的展開。

另一種意識型態的廣播出現於一九三〇年代早期。宗教機構爲了將福音傳遍全球，開始建立國際廣播服務。梵蒂岡廣播電台(Vatican Radio)創始於一九三一年一月，教皇曾親蒞祝福。隨後數十年裡，類似廣播電台遍滿全球。當基督教成爲國際宗教廣播的主流時，埃及的「神聖可蘭之音」(Voice of the Holy Koran)和在利比亞及沙烏地阿拉伯的回教廣播電台，紛紛起而與之抗衡。此外，許多國際廣播電台節目中，也包含相當數目有關信仰的節目。

雖然，廣告是否可看成一種意識型態的廣播，仍待探討。但是國際商業廣播電台，却是在國際廣播早期歷史中，便佔據一個相當的地位。一九三三年，盧森堡廣播電台開始對其他歐洲播出混合著流行音樂、新聞和廣告的節目。而較之更早，數個法國廣播電台，如巴黎廣播電台和諾曼第廣播電台(Radio Normandie)等，在一九二五年便向英國播出一些由廠商提供贊助的節目了。

美洲方面，則以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於一九二三年向拉丁美洲國家播出的廣播爲發端，只是廣告的播出直到一九四一年才獲得允許。

國際商業廣播電台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後，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的成長，歐、亞、非、中東各地陸續有新電台的成立。連繫了自紐奧良（New Orleans）至邁阿密（Miami），涵蓋全美各國內廣播電台的二個國際商業廣播電台，並於一九八二年開始營運。而它們只是一長串美國國際商業廣播電台登記名單中，排名最前的二座。

最後，我們介紹國際廣播中較特殊的一種類型——「秘密廣播電台」（clandestine）。秘密電台的廣播，通常偽裝成是在當地播出，可是實際上却可能是由遠在千百哩以外的電台所播出。有些人稱呼那些凡是不為執政當局許可，並以一個反對團體名義所播出的節目，都算是秘密電台的廣播。

秘密電台最早出現在西班牙內戰時期，歷史最悠久的秘密電台——「自由西班牙廣播電台」（Radio Free Spain），從西班牙內戰持續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仍有廣播，而這個電台幕後真正的製作者，則大部份來自蘇聯及羅馬尼亞。

二次世界大戰，大量的秘密電台紛紛成立。它們的目標無所不包，自製造部隊間的紛爭，鼓動軍人放棄職守等，至令敵對國人民感受痛苦、恐懼等都可能是在它廣播的範圍。

這些電台有的只持續短暫的數個星期，有的數月，還有些則延續數年之久。可是當二次大戰結束時，所有電台也隨之消失。

但是，沒有多久，新的秘密電台再次出現。大部份是來自蘇聯、東歐，和稍後的中共、北越、北韓等國家，常肆意攻擊別的國家。

越戰期間，祕密電台的出現和使用也相當的顯著。另外，第三世界政局的緊張情勢，通常也因而出現不少的祕密電台。

祕密電台、商業電台、宗教電台、政治意識電台和專為殖民地國民播出的電台，形成了國際廣播電台的五種基本型態。當然有些電台可能會是在一個政治架構中，播出宗教性或文化的節目，並非像我們的劃分，一成不變。

如果我們以二次大戰為分水嶺的話，戰前這五種國際廣播電台類型，便已具有相當規模。戰後，我們發現大部份的國際廣播電台，只是這五種類型的重覆，最多不過是型式上更具規模和精鍊罷了。

二次大戰時，國際廣播電台的數目急劇上昇。由於這些電台的增加和戰爭有關，因此，按道理來說，戰爭的結束也將會導致這些電台的消失。事實上，的確有些是消失了，如戰敗的德、日二國失去他們的國際廣播電台，並直到數年後才重獲准設立。另外BBC、VOA也遭到相當的裁減。但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國際廣播電台，表面上雖也減少一些節目的播出，暗地裏却處心積慮的大肆擴充各項人手和設備，並展開一項聯合的廣播策略，猛烈抨擊美國援助西歐的行動，同時在廣播中支持全球共產主義的擴張。

蘇聯的作法，使得美國國會重新考慮，撤銷美國之音是否為一項明智的決定。幾經思索，美國之音不僅得以保留，同時更設立一系列高度專業化的國際廣播服務，其廣播範圍藉轉播站之助，可達到全球大部份地區。這些新設立的廣播電台，就是自由歐洲廣播電台（Radio Free Europe

自由廣播電台 (Radio Liberty) 和自由亞洲廣播電台 (Radio Free Asia)，都在一九五〇年代開播。前二者至今仍繼續維持播出，自由亞洲廣播電台則於一九五五年撤銷。

這些廣播電台有個特色，它們並不是所謂的祕密電台，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並非官正式資助的電台。如果我們以色譜作為電台的分辨的話，它們可稱作是灰色的國際廣播電台，有別於黑色 (祕密電台) 和白色 (官方電台)。

同時期，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共的國際廣播時數，都有一倍以上的增加；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廣播時數竟從十數小時激增到每週將近七百小時的播出。另外，蘇聯也在一九六四年發展第二座主要國際廣播電台，和平和進步廣播電台 (Radio Peace and Progress)，一方面向東攻擊中共，另一方面向西攻擊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和進步廣播電台雖然扮演著一個非官方喉舌的角色，事實上却受莫斯科廣播電台所轄，不僅共用相同的發射站、頻率，有些時候，甚至連播音員都相同。

因此，開始於一九三〇年代的廣播之戰，實際從未中止過，僅只是敵友關係數量的改變罷了。攻擊行為和干擾作法，仍被許多國家使用著。共產集團和自由國家所各自界定的「事實」和「真確」，幾乎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隨著殖民帝國的崩潰瓦解，許多新興獨立國家躍躍欲試，紛紛設立國際廣播電台，希冀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些許角色。開羅廣播電台 (Radio Cairo) 便是其中最著名者。埃及希望透過這個電台加速非洲和中東殖民地地區的獨立，因此大力支持如巴勒斯坦 (Palestinian)、阿爾

及利亞 (Algerian) 和肯亞 (Kenyan) 等地的獨立自由運動，並猛烈攻擊以色列。短短數年間，開羅廣播電台每週播出時數，便躋身世界國際廣播電台排名的前面位置。

以色列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經成立自己的國際廣播電台，較之開羅電台的設立更早。其主要任務，是聯繫散居世界上各個角落的猶太人；當然，反駁阿拉伯國家的廣播也是重要的任務之一。

對於許多新興開發中國家而言，設立國際廣播電台並非易事。但是許多國家仍然爭先恐後的發展國際廣播，其原因大都是受了革命狂熱和獨立的興奮潮流所影響。隨著時日的消逝，他們逐漸發覺要想維持國際廣播電台的設備和專業人員，是一個相當艱鉅的任務；以埃及的開羅電台都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其餘更小、更貧窮國家的困境可想而知。

但是上述這些問題却不存在於拉丁美洲各國，原因是這些國家中大多沒有國際廣播服務項目——今天情形仍然如此。或許拉丁美洲國家，缺乏與世界各國溝通觀點的興趣，或許政局的不穩定，是一個可能的因素；或許拉丁美洲國內廣播電台強烈的商業趨勢，阻礙了國際廣播電台的發展，我們無從得知真正原因何在。總之，拉丁美洲國家對於國際廣播的態度，表現得相當消極和被動。

唯獨古巴是一個例外，哈瓦那廣播電台 (Radio Havana) 是全球有數具有超強發射電波和高超技巧的國際廣播電台。這個電台設立於一九六一年，正值卡斯楚 (Castro) 崛起掌權後不久，蘇俄給予大量科技和經費援助。很快的，哈瓦那廣播電台便成爲古巴「革命外銷」 (exporting

revolution)的主要工具，廣泛的攻擊美洲國家政府的無能和缺失。它不僅使用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英語來播出節目，就連美洲土著原始語言，如Guarani, Creole 和 Quechua 都各有節目播出。

美國爲了對付古巴的挑釁，透過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於一九六〇年設立天鵝廣播電台（Radio Swan，稍後改名美洲廣播電台Radio America）。該台主要目標就是支持古巴境內反對卡斯楚的革命團體。雖然CIA和天鵝廣播電台有密切關係，表面上，該台却偽裝成爲一個商業廣播電台，必須依賴商業廣告的播出來維持收支。這個電台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消失。

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間，宗教電台在設備及數量上呈現顯著的增加，大多數的電台都由美國福音傳組織所設立。以數十種語言向全球播出節目，形成一個全球廣播網。因此，在談論國際廣播時，國際宗教廣播電台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部份。

綜觀國際廣播的成長，雖是一般現象，却並不穩定。有時突然百家爭鳴，活躍異常；有時却又偃旗息鼓，悄然無踪。這種現象又以祕密電台爲最顯著。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許多祕密電台不復出現；即或仍有一些電台存在，其活動也較前大爲減少。

然而，就大多數國際廣播電台的情形來看，仍維持相當穩定的成長。每年都有一、二個新國際電台成立，許多舊有的發射站也更替威力更強大的新式設備。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聽衆，也仍繼續擁護國際廣播電台的服務，肯定其價值。

回顧國際廣播過去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許多國際廣播電台的成立是建立在一個互動（互相反應）的基礎上。一九三〇年代和二次大戰也帶給國際廣播許多值得參考的成功或失敗實例。只可惜，現今國際廣播機構却很少加以注意。雖然過去的事例無法在今日加以複製重現，但是却仍具有相當的意義，值得我們再加深思探索。



## 第三章 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對國際廣播的成長和日後的方向，產生極大的影響。許多國家便是在這個時刻開始發展國際廣播，或是擴展原先的電台。而廣播技巧和節目型態的實驗，也導致了今日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廣播風貌。二次大戰成爲許多國際廣播電台的轉捩點和根源。

以下，我們將選擇五項意義最爲深刻，影響最爲深遠的戰時廣播作業，加以分別討論。

### 第一節 秘密廣播電台

二次大戰中，最活躍和最多采多姿的國際廣播，或許應首推秘密電台了。這些電台通常並不標示它們的位置和身分，有的甚至僞裝成是在「敵對」國中的廣播。蘇聯極可能爲最先使用此種伎倆的國家，只是由於缺乏證據，無法證實。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班牙內戰中，德、蘇便開始了秘密廣播電台的作業，分別支持戰鬪中的雙方。

二次大戰的爆發，使得秘密電台的運用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德國首先設立許多秘密電台，針對歐洲國家施行廣播，以期軟化他們的民心士氣和對德國的敵意。稍後蘇聯、英、美、義

和日紛紛起而效尤，祕密電台的數目飛快的增加。

這些電台，有的僅只維持短暫的壽命，有的却能繼續運作數年之久。有的對象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如潛艇中的船員或工廠中的工人，有的則是針對一般的泛泛大眾，並無特定的對象。

要吸引聽眾的注意並非易事，不僅需要高度技巧，同時還需豐富的資料。此外，由於頻率並無優先權的保障，常有被佔用之虞。爲了克服這些困難，許多祕密電台便使用和目標區國內廣播相近的頻率，一方面避免干擾，一方面聽眾能有較多發現和收聽祕密電台廣播的機會。

假使祕密電台想要成功的使人誤認爲是在目標國內從事廣播，那麼他們的每一個步驟作法，都要經過仔細的安排和執行，播出的時間不能太長，節目表也要時時更動，否則無可避免的，勢必會被當局識破。因此，電台的播音員和撰稿者，都必須把他們的角色扮演得盡善盡美。適當人選的不足，常成爲祕密電台的一大困擾，戰俘營（prisoner-of-war camps）因而成爲招募合適人選的主要場所。

由於祕密電台係各自針對不同地區和目標，使用不同語言，運用不同策略設計，因此它們如何執行任務並無特定事例，可爲統一說明。不過，Gustave Siegfried Eins 這個偽裝成由一羣德國反對希特勒的軍官所主持，在德國境內播出；而實際上，其廣播是來自英國的電台，或許可說明大部份祕密電台運作的特質。

首先，類似這樣的一個電台的存在，是很容易讓人相信的事，因爲德軍軍官中有些人反對戰爭，已是公開的祕密。他們自然較之一般民衆有更多的機會來接近廣播設備，並較持續的使用這

些器材。

這個電台的締造者，Seton Delmer 深知納粹和德軍的心態，通曉他們的談吐用詞，並明瞭各種製造議題的手法。無疑的，由他來主持電台是最合適不過了。他親自挑選對德語有相當造詣的人選，施以嚴格訓練，直到他們的說、寫都十足像是德軍軍官為止，才展開正式作業。

電台的主要播音員被簡單的稱爲「Der Chef」。一九四一年，在這個電台首次播出中，捏造出一則有關納粹高級軍官 Rudolf Hess 潛逃的評論，當時 Hess 事件已經成爲衆所皆知的新聞，這段評論自然引起相當的注意。表面上，評論是乎是在痛斥 Hess 的行爲，實際却反映出德軍意志的消沈和前途的黯淡，成功的達到動搖民心的目的。

任何祕密電台的成功，都有賴情報的適切供給。假使一個電台自稱是在其他國家內部進行廣播，那它所播出的新聞就應當是該國最新發生的事情。掌握時機也相當重要，例如情報人員的消息，顯示德軍軍官開始紛紛議論德國政府官員放縱情慾的行爲，這時可能是製造一、二項有關報導的好時機。即使報導全屬杜撰，也會廣受歡迎，適切人心，因而極可能被人所深信不疑。

直至大戰末期，祕密電台的活動愈來愈無法加以掌握；許多電台都發展出高度技巧的運作方式，致使真偽莫辨；而且隨著戰局的轉變，電台的出現或消失，也叫人無從捉摸。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間，納粹一口氣設立六、七個祕密電台，分別對美、英、法、蘇等國部隊展開廣播攻勢，其中對蘇俄部隊廣播的一個電台，還偽裝成是 BBC 的廣播，以消極的語調，悲觀的認爲蘇俄在東線的戰事將成爲許多紅軍「葬身之所」。

正當大多數秘密電台多采多姿的在各處活動時，軍方指揮官和政府官員中，有些人並不願意對這些電台加以援助，他們視秘密電台如果不是一種浪費時間和精力的作法，便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不過，秘密電台也有受重視的例子，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便積極運用這些電台來製造德軍潰敗的假消息，以引起德國人民的恐慌。

秘密電台的運作，究竟得到多少的成功，導致那些的失敗，由於缺乏實際的研究調查，很難下一論斷。但是，戰後出現或消失的許多秘密電台，却大體是沿循戰時秘密電台的作法，有如它們的複製品一般。

## 第二節 訴求主題

雖然早在二次大戰發生之前，德、蘇等國便發現，如果在某些主題上大作文章，廣播很可能會產生較有效的影響力。但是，一九三〇年代中，各國廣播電台却在有意或無意間，儘量避免使用「訴求主題」的方式。

二次大戰劇烈的改變了這種情勢。從此，國際廣播便成了「宣傳兵工廠」（propaganda arsenal）中的一項重要「利器」，被賦以特定的任務。這些任務範圍廣泛，可能有時是從事支持敵對國被放逐的流亡政體的廣播，有時則是鼓吹敵對國中的聽眾，進行各種破壞行動。

有些電台的廣播具有相當高度的戰略意義，廣播本身和某些特別軍事行動是相配合著的。例

如在廣播中煽動某特定城市居民大批逃離該城，遂致使洶湧逃難人潮阻礙了敵軍的行進路線。

雖然，有關二次大戰中的國際廣播，缺乏全面而完整的分析研究，但是少數個人在這方面的努力，却提供我們選擇合適「主題」的基礎。這些人的分析和我個人檢查戰時德、義和俄等國的廣播文稿及錄音帶的心得，歸結出下列五項最基本的「訴求主題」。

### 一、「我們有得勝的力量」

任何一個作戰中的國家，都希望能向其人民、盟友和敵人證明本身力量的強大。困難的是事實往往無法盡如理想，而且想要令敵人信服，也不是件易事，因為這是他們所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

但是對義大利、德國和日本而言，這套訴求主題，直到戰爭中期，還是非常有效並且使用起來毫不費力的方法，他們只要不斷宣告新的勝利便行了。（有段時間，德國勝利的消息太多了，以致於必須刪減若干報導，並將這些多出的資料保留下來，留待以後使用。）

相形之下，蘇聯、英國和美國在這段時期則面臨了艱困的局勢，廣播訴求主題只能強調部隊和人民，甘心樂意的為屬於他們最後的勝利而犧牲奉獻。

戰爭中期，盟軍戰況轉趨有利，北非登陸成功，和蘇聯開始自東線展開反攻，使得軸心國和同盟國的優劣之勢互易，德國和義大利開始採用早先同盟國的廣播訴求方式：我們繼續戰鬥的意志仍然旺盛，而且人民更是我們最強大的一股力量。

戰爭末期和初期幾年的情形，比較起來，全然改觀。雖然，德國仍然繼續宣稱有足夠的能力和意志來抵擋盟軍攻勢，但已是欲振乏力，於事無補了。

另一方面，英國雖急於使用威力的訴求主題，却遭受相當的限制，因為軍方認為不宜過度渲染戰事。但是，意外的却是，一則有關威力，特別是軍方威力的平鋪直述的訊息，反倒較激情報導得到更大的效果，實在是始料所未及的一項發現。

## 二、「你的朋友嗎？其實不然」

分化敵人，進而克敵，勝敵是一項古老的伎倆，但是，它悠久的歷史並沒有減損它成爲二次大戰中的一個主要的訴求主題。

納粹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對法廣播中，使用這種訴求主題。結果使得許多對於政府和部隊領導者缺乏信心的法國人，轉而同情納粹德國，並且不信任英國。

由於歐洲，特別是東歐同盟國間，相處不佳，無法成爲真正可靠戰友，因此使得德國有機可乘。以下我們舉出一個例子，作爲參考：

戰士們，你們究竟是爲誰而戰？究竟是爲了誰，你們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慘遭屠殺的噩運？難道是爲了那些在荷蘭、法國和英國的資本家嗎？——德國廣播電台對荷軍之廣播，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日。

就某一方面而言，這項主題或許是所有主題中最有效力的訴求方式。因爲，很顯然的，參戰

各國雖互有結盟，但是由於動機互異，各懷鬼胎，是無法捐棄己見，坦誠互信的，也因而給予分化的主題訴求一個大顯身手的機會。

### 三、「假使你認爲目前處境已經夠艱困了，且等著瞧吧！」

進行全面的恐怖威脅，也是另一項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戰時宣傳方式。二次大戰中，在許多不同的情形下，這項訴求主題被廣泛的運用著，有時是在一種新式武器發展出來前不久使用，有時可能在一次戰役中間，或是在一次主要挫敗之後使用。

這項技巧通常並不作詳盡解釋，只是在廣播中大量使用諷刺性的暗示，以期在聽衆內心深處，激起遠超過現今他們所經歷更爲強烈的恐懼。BBC對德國的一則廣播可作爲很好的例子。

你是否聽見鐘聲在滴答的響呢？

你是否聽見屋裏的鐘，每秒都在發出滴答的聲響呢？

一、二、三……六、七。

每七秒鐘就有一位德軍在蘇俄陣亡。

據報導，德軍在蘇聯境內最初的四個月戰役裏，陣亡人數已經超過一百萬。

那就是說，

每星期陣亡八萬人。

每小時陣亡五百人。

究竟爲的是什麼呢？難道是爲了那些已遭損毀的土地嗎？

究竟是爲了誰呢？難道是爲了阿道夫·希特勒嗎？究竟爲的是什麼呢？難道是權勢嗎？

每隔七秒鐘……一個小時接另一個小時……；從白天到夜晚……；又從夜晚到白天……

每隔七秒鐘。

會不會是你的兒子呢？會不會是你的丈夫呢？會不會是你的兄弟呢？

每隔七秒鐘……射殺……溺斃……凍死。

到底還要持續多久呢？

每隔七秒鐘。

究竟爲的是什麼呢？究竟爲的是什麼呢？

當戰事轉趨對德不利之時，德國廣播員發展出一種「祕密武器」的恐怖訴求方式。一九四四年的六月，V-1火箭開始襲擊英國，廣播策略便以此作爲主題；一方面藉以激勵德國民心士氣，另一方面則可打擊敵人，動搖其繼續戰鬥意志。據戈培爾的一位幕僚指出，「V」字是代表了「報復」(Vergeltung)的意義，同時還暗示了將有更多類似武器，V-2, V-3等，隨後便會發展出來，對敵國人民心理產生更大的壓迫和恐懼。

像這種採取「還有更壞、更可怕的情況，在後頭即將到來」的廣播訴求主題，主要的困難便是必須要能夠令人信以爲真，因此常有賴戰爭本身的情形而定。

當德國在大戰最初幾年勝利頻傳的情形裏，人們很容易便會相信德方的廣播，而恐懼萬分。

但是，假若一項恐怖宣傳持續數月之久，却不見有特殊毀滅性武器攻擊跡象，或是當這個武器出現時，所造成的毀壞程度，並非如預期廣播所述；那麼，宣傳人員便無可避免的面臨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

#### 四、「你們的領袖正在誤導你們」

這項訴求主題和「你的朋友嗎？其實不然」的訴求主題，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是由於考慮重點不同，因此在二次大戰中，分開各別使用。

其基本的訴求點就在想讓廣大民衆對於國家領導階層，特別是政治領袖，失去信心。詆毀領導階層的方式有數種不同的型態。其中之一就是採取歷史的比較，例如拿希特勒時代以前，德國政治的貪污腐敗和希特勒目前的政局相比較，說明兩者其實並無不同之處，希特勒先前的承諾都是騙人的幌子。

另外，有的則使用挖苦諷刺的手法：

當那些領導者高談人人都應有相同的犧牲時，我不禁想失聲大笑！不知道戈培爾有否告訴你有關他在柏林的城堡、別墅，和一座有五十個房間的華廈？在納粹掌權的這八年間，肥飽了許多納粹的領導者，可是却使人民被剝削得一無所有。——BBC對德廣播，一九四一年。

還有的則使用階級差距、貧富不均的衝突，或是在廣播中調侃一些政治領袖的能力不足，這些方式都能成功的增加聽衆對於他們的領袖的不滿。可是另一方面，這種作法也是一種冒險的賭

注，因為聽眾可能會認為是敵人蓄意的毀謗和離間，爲了不讓敵人伎倆得逞，反倒轉而更積極支持他們的領袖。

有時，肆意攻擊敵國領袖的殘暴貪污，可是自己本身作法却與之毫無差別，這樣也是無法使人信服其廣播訴求的。

##### 五、「我們所致力奮鬥的，乃是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有些國際廣播提供了對未來美好的憧憬，有的內容僅只是簡單的提出呼籲：「何不讓我們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血腥行爲，那將是何等有益的事情！」，另外有些內容則以包含著哲學和實際意味的名詞「新世界」(New World)，作爲前瞻的導引：

人類生活的進步是自然的過程，是無法加以阻止的。任何試圖以武力中斷自然演進的作法，都會導致劇烈的紛亂。世界已經到了更替一項新秩序的成熟階段……，因爲歷史的演進必然使得改變無法避免。今日，德國正代表了那些瞭解這種轉變的必然性的國家。

——德國對北美洲的廣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對於廣播人員而言，他們之所以持守上述五種訴求主題，大部份的原因是這些訴求主題正反映了國家領袖，甚至是全民的信念；雖然，他們個人私底下可能根本就不贊同使用這些訴求主題，或是對它們的效果抱持懷疑的態度。

強調訴求主題的廣播方式，開始於二次大戰之前，盛行於二次大戰之時，而直到今日仍然繼

續被使用著，只是訴求重點有些改變罷了。例如：「我們有得勝的力量」這項訴求主題所強調的可能不再是軍事，而是經濟。「假如你認爲目前處境已經夠艱困了，且等著瞧吧！」這項訴求主題則可能指的是其他國家內部的問題，而且有愈形惡化的趨勢（如共產國家廣播電台常報導資本國家中失業率的不斷升高和勞資雙方尖銳的對立。）

國際廣播在二次大戰裏最顯著的改變，或許可以說當屬訴求主題的運用了，至今國際廣播仍深受其影響。

### 第三節 個人特質

雖然國際廣播在二次大戰，以訴求主題的運用爲最大的改變，但是如果談到廣播的效果，「個人特質」或許是較「訴求主題」更爲重要的一個因素。

實際上，這二項因素常是相輔相成，混合使用。例如，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的廣播是由海軍少將艾里斯·沙查里亞士（Ellis Zacharias）負責。在他的廣播裏，他以一種率直的、令人尊敬的和誠摯關切的語調，贏得日本人的好感，並且使艾里斯的訴求主題：日本可以選擇無條件，但却是光榮的投降途徑，獲得日本民衆的熱烈迴響。因此，有些廣播者的個人特質便常和某一類的訴求主題連結起來，被人一起認同。

個人特質成爲國際廣播的一項重要因素，早在二次大戰之前便已經有了明證。艾迪·史塔茲

(Eddie Stars)可稱得上是「歷史最爲悠久」，最富個人獨特風格的國際廣播節目主持人。一九二八年，他在荷蘭開播一個名爲「快樂電台」(Happy Station)的廣播節目，這個節目除了在大戰幾年中停播外，一直沒有間斷的播出到一九六九年，他退休爲止。這項記錄，即使是二次大戰中著名的廣播者喬易斯(Joyce)和龐德(Pound)也難與之抗衡。

德國在大戰早期便確認個人特質在廣播中的重要性，雖然他們並沒有十分具體的計劃，但並不遺餘力的發展具有個人獨特風味的廣播。其中對北美的廣播，就包括有保羅·瑞弗雷(Paul Revere，一位自稱愛國者人士，警告美國留意英國的欺詐行爲)、唐納·戴伊(Donald Day，前芝加哥報紙特派員)、康絲坦絲(Constance，費城的社會名流和女繼承人)等人。

此外，義大利也有著名的廣播員伊瑞拉·龐德(Ezra Pound)，日本有「東京玫瑰」(Tokyo Rose)、「莫比迪克」(Moby Dick)和「孤兒安妮」(Orphan Annie)等，都是具有特別個人風味，令人印象深刻的戰時廣播者。

這些著名的廣播員之所以投身軸心國家行列，大多是因個人對軸心國家存有好感或同情態度，因此雖然他們仍是同盟國的公民，却紛紛背叛祖國，投向敵國。另外有些人則是以戰俘身份，因種種理由，決定與他們的敵人合作，成爲敵方的廣播人員。大多數人，幾乎從來都沒有從事廣播的經驗。

盟國方面相形之下，則顯得比較缺乏這方面的著名人物，但少數優秀的廣播員，其表現毫不遜於軸心國家。英國在一項名爲「V代表勝利」(V for Victory)的廣播策略中，透過一些虛

構，但却具有特殊個人風格的角色，贏得了相當熱烈的好評，聲譽卓著。其中以唐納·瑞奇（Donald Ritchie）扮演的「布里頓上校」，最受聽眾讚賞。

BBC 對德廣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林德利·法瑟爾（Lindley Fraser），則以真實姓名從事廣播。他主要依靠智慧、幽默和權威性的談吐，折服了廣大的聽眾，使他們信服他的觀點。因此被人譽為「在德國人心目中，除邱吉爾外，林德利·法瑟爾是最廣為熟知的一位英國人」。

軸心國和同盟國也分別針對特定對象，如士兵和海員進行富有個人特色的廣播工作。而在這些廣播中，女性播音員遠較男性播音員受到更多的注意和喜愛，原因是女性的廣播富有挑逗性和誘惑性，能輕易的吸引聽眾的注意力。德國的「軸心國的莎莉」（Axis Sally）和日本的「東京玫瑰」是最著名的兩個例子。她們的廣播常能有效的引起聽眾的思鄉之情，或是製造聽眾間的嫉妒和猜疑。她們以充滿喜悅、溫馨和熱情洋溢的語調，與遠赴前線作戰的士兵或海員暢談各種事物。很快的，這些女性播音員迷人的嗓音便成為同盟國士兵和海員們最佳的慰藉。由此可見，具有個人特質的廣播所能產生的影響力的強大，實在難以估計。

由於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資料，我們無法斷言具有個人特質的廣播，究竟真正的效力有多大，但是根據少數證據顯示：只要敵方能繼續保持常勝姿態，一般聽眾更容易相信敵方的廣播。而且如果播報者的個人特質普獲好感，那麼，聽眾對於廣播者的觀點，會愈發願意信服採納。

今天國際廣播中具有特殊個人風味者，似乎已不多見。其實收音機是最能夠建立個人性溝通的傳播媒體，因此只要多下功夫，塑造節目新的風格形象，是不難發展出如二次大戰中多采多姿

，具有個人特質的廣播盛況。

#### 第四節 節目型態

二次大戰前，多數的國際廣播節目仍侷限於新聞、評論、特寫、音樂、綜合報導等方式，而且評論、寫作仍不脫那種極其正式化的模式。可是到了二次大戰中期，由於個人特質成爲廣播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因此許多節目爲了配合這種新趨勢，節目型態有了很大的變化。

就以音樂節目爲例，從前只是播放音樂罷了，現在則要求男女主持人在曲子銜接時刻，針對其聽衆心理，製造爲何而戰的疑惑和恐慌，或是使聽衆不自覺的意識到處境的困難和危險，加深他們精神上所承受的重擔。

內容幽默風趣，但又充滿嘲笑譏諷的對話型態，從前只出現在國內廣播節目中，現在也成了國際廣播節目慣常採用的一種方法。如BBC對德廣播中的一個角色「弗勞·娃妮基」(Frau Warnicke)，便是以一位柏林婦女眼中所見，德國最近發生的事情，包括她個人的想法和評論，作爲節目的主題，使得節目顯得特別生動而尖銳。

另外，有些節目也採用一種「電話交談」方式，設計出美國人和德國人，或是加拿大人與美國人等之間的談話。當然，談話內容也是早經妥善籌劃過的，例如德國之入侵蘇俄，乃是爲了抵抗赤色共產爲害歐洲，或是將某一類型人物塑造成一種很可笑的形象，打擊他們的聲譽威望。

還有些廣播人員，針對敵對國政治領袖的演說，發展一種「對答」式的節目型態。德國廣播電台的卡特恩巴奇（Kaltenbach），回答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廿七日所發表的「爐邊閒談」（Fireside Chat）錄音，其內容如下：

羅：我們所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是爲了要將納粹獨裁政體逐離自由的領域。

卡：總統先生，爲什麼您要在這種細微瑣事上，徒費心神呢？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個貧窮的船員，他討厭海呢！因此，我敢擔保他一定不會願意乘船遠離自己的故鄉的。

羅：德國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奪取全球。

卡：總統先生，得了吧！別這樣大驚小怪的。您和我一樣清楚阿道夫·希特勒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房地產商啊！

有時，娛樂性質的節目型態，也可作爲宣傳的方式。BBC就曾利用猜謎遊戲來達到宣傳的目的。不過，有些廣播人員對於娛樂節目的宣傳效果，表示了相當的懷疑。

再一次，我們無法就節目型態的變化，到底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效果得出結論，唯一能肯定的是，由於節目型態的多元化，使得國際廣播不再拘泥形式，顯得多采多姿，活潑生動。這不能不歸功於二次大戰時期，廣播節目的變化所帶來的貢獻。

## 第五節 廣播如同一項策略武器

早在二次大戰之前，國際廣播電台就被運用於策略上了，而大戰使得這種運用媒體的方法，更有了戲劇性的發展。

對大多數電台而言，當他們成爲策略上的一項武器時，有關聽衆的調查研究，似乎是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因此它們乃各自根據經驗，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戰爭理論，或是基本原則。

廣義的說，二次大戰中的國際廣播電台所使用的策略，大體不外乎攻擊和防衛兩種。它們並非截然分開——事實上，多數大型國際電台，都混合使用這兩種策略——只是其中一項策略可能較常被電台使用罷了。

在攻擊策略中，攻擊敵人要害弱點，自然是訴求主題的重心。至於防衛策略，則通常是強調如何駁斥敵人報導中所揭露自己的錯誤和缺失。

丹尼·凱茲 (Daniel Katz) 在分析 BBC 於戰前對北美的廣播後發現，如果只是採取防衛性策略的話，不僅自己會處處受制於敵人，而且真相會被愈描愈黑，愈無法加以澄清。因此他建議：不妨反被動爲主動，抓住敵人的弱點予以狠命的一擊，或許還可佔據上風。

然而，如果敵人的廣播正巧擊中要害，而且這些缺點又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的話，那麼上述反被動爲主動的方法，可能便無法奏效了。這時便得採取其他策略，例如作擾亂性的攻擊廣播，一方面可以混淆敵人的攻擊，同時還可以轉移聽衆的注意力。但是這種策略的運用必須相當小心，否則一旦被聽衆誤認爲只是雙方各逞意氣，互相謾罵的話，可能從此對雙方都不會再存有良好的印象。

另外一種策略是採取「呈現正反兩面」(two-sided)的宣傳方式。一方面不管敵人是否注意到這些缺點，自己先坦然承認自己並非十全十美，毫無缺失；但是另一方面則提供大量正面和積極的報導，以為平衡。這種策略較常為英、美等國使用，至於軸心國家和蘇聯則絕少使用。

這項策略的基本假設就在於認為：既然世人皆非完美，而且無法對事物皆期待能夠完美，那麼與其自認完美無缺，還不如呈現自己的正反兩面，更可以取信於他人。但要留意的是，如果聽眾早已習於接受正面的宣傳，則一旦遭遇負面消息，很可能會因而動搖他們原先的信念。

最後，我們要談的是所謂「多變型」的策略。一個國家可能同時設立數種不同性質的國際廣播電台，有些是「白色的」(由官方正式出面支持)，有些是「灰色的」(表面與政府無關，暗地裏却由政府提供經費援助)，有些是「黑色的」(祕密電台)。這些不同性質的電台常會產生互相衝突的報導。例如，BBC在報導邱吉爾時，慣常都是持著一種積極擁戴的態度，但是由英國主持的Gustave Siegfried Eins則不時的痛斥邱吉爾。理論上，這種多變型策略，可以混淆敵人視聽，使分辨不出報導真偽；同時，一方面可透過「灰色」或「黑色」電台攻擊敵方，却又可避免敵人的指控。此外，由於這些電台有的經過了偽裝，因此能夠有效避免敵人干擾，達到更多的聽眾。

這種多變型策略至今仍為美、蘇等國所使用。雖然需要付出許多額外的花費和心血，這些國家仍然深信多變型策略有其存在的價值。

至於其他策略，也同樣繼續活躍在國際廣播舞台上。只是，當VOA依循「呈現正反兩面」

的策略時，却遭受不少來自國會議員的批評，他們認為這種策略使得「有關美國的缺陷不良部份，被過份的加以宣揚報導」可能因而影響美國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 第六節 結 論

無疑的，現今國際廣播中，許多重要的運作方式，都可以溯源於二次大戰之時。雖然有少數的發展年代早於二次大戰，但是它們却都是在經歷大戰後才發展至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些運作方式大多沒有經過科學的實驗和調查，因此它們的威力究竟如何，無人可以提供圓滿的答案。可是，直到今日，它們仍然繼續存在著，並且普遍的被承認具有很大的效力——或許我們僅能解釋：時間是最好的考驗，這些運作在經歷了時間的淘汰後，仍然屹立不搖，足證其價值是不可磨滅的。

隨著二次大戰後冷戰的開始，使得許多戰時電台工作人員仍被賦以相當的重任，因為他們熟知戰爭中所需使用的種種策略，畢竟冷戰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唯一與戰時不同之處，就是這時更強調意識型態方面的策略，心理作戰成爲國際宣傳的重心。

最後，二次大戰中的許多運作方式之所以一再被重覆使用，人類的慣性可能也是一項影響因素。一旦一位廣播人員習慣於一種處理節目的方式，可能便不會再想嘗試發展新的廣播策略，或是新的節目型態了。

往後各章中，將逐一介紹許多國際廣播電台所發展出來的新型態、新內容等，其中有一部份，對二次大戰時期的聽眾而言，可能會顯得相當親切而熟悉呢。



## 第四章 美國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和世界上多數主要國際廣播電台不同，美國之音並非起源於國內廣播系統的一部份。美國國內廣播事業，一開始便由私人所經營，而私人企業對於國際廣播並沒有多大興趣。即使是通用電器公司，在一九二三年的國際廣播實驗，主要也只爲了測試其傳送設備的性能是否完善而已。

一九二七年，通用公司首度提供了專爲國外聽衆製作，每週固定播出的節目：節目時間約一小時，主要內容有音樂和新聞，以西班牙語發音，每週一次對拉丁美洲地區播出。

至於純粹從事對國外聽衆提供廣播服務的電台，則首推 WIXAL 於一九三三年由波士頓附近開始了它的廣播服務。該電台擁有者，華特·李蒙 (Walter Lennon) 的理想是希望它能成爲一個空中廣播學校，以及和平的促進者。

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以後，陸續有新的電台加入國際廣播服務的行列，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國家廣播公司 (NBS)、西屋公司 (Westing house)，都有專屬的國際廣播節目。然而，特別爲國外聽衆設計製作的節目却不多見，許多節目只是國內廣播節目的重播而已。

這種現象有數種解釋原因：首先，許多電台有一種理所當然的假設，認爲英語是國際性的基本語言，自然能夠被一般聽衆所瞭解。其次，大多數電台缺乏對其他國家有相當認識體驗的工作

人員，同時發射站的電力不強，聽衆在接收上不盡理想。因此這些電台不願耗費太多經費來改良節目內容和播出型態。

美國國會於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對於一項由政府經營的國際廣播服務提議，表現出相當的興趣。這項議案由紐約州議員艾曼紐·錫樂（Emmanuel Celler）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提出。在深刻關切法西斯廣播宣傳對拉丁美洲造成的影響下，他建議由海軍設立一座短波電台，以「促進美洲地區國家彼此間更良好的瞭解」。

但是這項議案却遭受來自各方的反對，NAB 總裁馬克·埃茲瑞居（Mark Ethridge）甚至抨擊錫樂的提議是「代表了納粹的哲學」，並且強調「政府管制將因而加諸私人企業」。這項提議終告失敗，另二項類似議案也遭遇相同命運，主要原因是國會及工商界，不喜歡政府涉足早已由私人經營的企業。

隨著歐洲情勢的惡化，由政府提供對拉丁美洲及歐洲的廣播節目，逐日增多。但各電台對國際廣播仍然不予重視，而且在美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軸心國宣戰後，仍然缺乏一套明確的國際廣播計劃。

直至一九四二年六月，羅斯福總統設立一個政府部門——戰時新聞局（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才正式有一專職機構，負起國際廣播的任務。

OWI 成立後，首先便將所有私人國際電台納入政府管制。接著迅速增加發射站的電力和語言節目，以便告訴全球人民，美國有信心和能力獲致戰爭最後的勝利。從一九四二年二月起，這

些廣播便被稱爲「美國之音」，以迄於今。

在整個大戰期間，集體合作的宣傳策略，顯得相當困難，部份原因雖是涉及數個不同的部門和機構，協調不易，但主要原因還在 OWI 內部的分裂。

由於國外廣播作業主要以紐約市爲據點，而國內部份和 OWI 負責人艾默·戴維斯（Elmer Davis）及其幕僚群留在華盛頓；羅勃·謝伍德（Robert Sherwood），一位著名的劇作家，早在 OWI 成立以前，便由羅斯福總統邀請擔任國外消息處理的負責人，乃起而與戴維斯分庭抗禮。

謝伍德曾被授以相當權限可以自由選擇工作人員，因此戴維斯和其他國會議員曾批評那些工作人員流於個人主義或是不支持盟國政策。當一九四四年，戴維斯打算撤銷數位國外廣播作業部門高級人員的職務時，謝伍德予以駁斥拒絕，最後由羅斯福總統親自出面調停，才使紛爭平息。這些事件導致後來的國會和一些新聞界人士懷疑 OWI 本身的管理能力，並重新考慮戰後這個組織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在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羅斯福總統請求聯邦傳播委員會（FCC），評估戰後美國政府對於國際廣播應採取的政策，並爲之建議。一九四四年，一個由政府廣播工程人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草擬了戰後有關國際廣播的計劃。該委員會同時邀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亞瑟·麥克馬洪（Arthur McMahon）參與評鑑工作。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提出報告，支持戰後應繼續維持國際廣播服務，並贊成由中央統轄管理，或由一個獨立機構，或由聯邦政府管理都是可行之法。

戰後，杜魯門總統將這項國際廣播服務暫時納入國務院的管理，直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爲止。

## 第一節 戰後的體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國際廣播部門（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Division, IBD）成立，專門負責管理當時規模甚小的VOA。由於VOA是唯一仍在作業的國際廣播電台，IBD得以發展出戰後國際廣播的政策。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國會連續通過法案，確保VOA能繼續維持運作，雖然許多國會議員，特別是共和黨籍議員試圖加以阻撓，終究沒有成功。

反對者主要持三項理由：（一）政府不應對外發佈新聞；（二）短波廣播不應由政府獨佔；（三）政府部門中，包括VOA，使用許多不誠實人員，以致無法信賴這些人能夠公正的將美國的形象報導給其他國家。

而事實上，由於國際廣播利潤不高，FM和其他電器設備的發明可獲致更高的利益，加以電視的興起，私人從事國際廣播活動的意願並不高。只除了CBS和WRUL表現出興趣外，其餘戰前曾從事國際廣播者，皆紛紛放棄這項企業。CBS之所以願意繼續，主要是覺得對拉丁美洲的廣播可吸引某些廣告主之故。至於WRUL則是因不願其教學廣播工作假手他人。

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史密斯—門德特法案（the Smith-Mundt bill），授權政府可以永遠從事國際廣播和教育活動。這項法案能夠如此輕易的通過，無疑的是由於冷戰活動的日趨尖銳所致。二百餘位國會議員先前的歐洲之行，使他們注意到共產國家是如何的使各種媒體來攻擊美國。他們也同時注意到了美國方面對於這些攻擊的反應非常軟弱，私人企業是無法承擔這種反擊的艱鉅任務。

## 第二節 美國之音秒冷戰

一九四八年六月，蘇聯封鎖西柏林，冷戰隨之達到劍拔弩張的局面。雖然VOA尚未完成反擊蘇聯惡意指控的準備，國會却已視之為對抗蘇聯宣傳的武器，以及對外政策的一項工具；VOA的成長，乃成必然趨勢。

當韓戰於一九五〇年爆發時，一切反對意見全部歸於沈寂。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四月發動一項「真理運動」（Campaign of Truth），指示媒介「顯示有關美國的真象以粉碎共黨蓄意的歪曲報導」。九月，更進一步指示反擊共黨及其媒介「：揭露它們的謊言……使它們的說法顯得荒謬可笑」。如此，開啟了「強硬路線」的廣播策略。

冷戰的加劇，使得VOA的預算也大幅增加，用以增強發射電力，藉此穿透蘇聯的干擾網，使自由之聲震撼鐵幕。

但是，另一方面攻擊批評VOA的聲浪再度升高，參議員麥卡錫(Mccarthy)反對尤力。他攻擊VOA的疏忽——沒有播出希伯來語言節目，因為官方認為「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個個反共，無庸多費神顧慮」——是有意偏袒共產主義。這項指控使得許多VOA工作人員辭職表示抗議。

VOA的強硬路線使它喪失不少中立而傾向西方的聽眾，同時隨著韓戰的結束和麥卡錫的指控，預算由原先二千二百萬美元，被裁減成一千六百萬美元。所幸的是，在這最艱困的日子裏，許多VOA的員工仍堅守崗位，毫不懈怠。

### 第三節 美國新聞總署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就任後不久，立即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傑克森委員會(the Jackson Committee)，研究有關對外宣傳活動的角色和組織。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委員會建議成立「美國新聞總署」(USIA)專門負責對外宣傳活動，而不再由國務院來管轄。

由於USIA承襲了全部舊有的體制，這項轉變對VOA的影響很小，僅止於由紐約市搬至華盛頓罷了。而國會方面，則繼續評估VOA在「對抗共產主義」的努力上究竟產生多少成效。

當喬治·亞倫(George V. Allen)於一九五八年成爲USIA的負責人時，他決定大幅度改變VOA的廣播作業，希望發展出一套全球性的英語廣播服務。亞倫認爲以特定語言對特定地區

的廣播，有時會被聽衆疑心是一種宣傳，因此，如果美國以其本國語言對全世界都提供劃一的節目服務，那麼將可增加這些廣播的可信度。他同時認爲其他國家的英語聽衆通常會較一般人獲得更多的尊敬和較高的權利。

亞倫同時支持「凡事都作誠實報導，即使可能因而遭受傷害」的政策。在他任期內，VOA詳細的報導了數件「棘手」問題：蘇俄總理赫魯雪夫（Khrushchev）要求柏林的合併、蘇俄太空火箭發射、小岩學校（the little rock school）廢除黑白差別待遇、U-2「偵察機」事件。國會雖有時抱怨VOA的報導揭露太多的美國黑暗面，然而亞倫常能在聽證會中以VOA的成就——如報導美國太空計劃、一九六〇年總統大選和一九五九年赫魯雪夫訪美等事例——據理以爭，甚至還爲VOA和USIA爭取到少額的預算增加。

#### 第四節 穆洛時代（the Murrow Era）

一九六一年一月廿九日，甘迺迪（John F. Kennedy）任命前CBS新聞主管愛德華·穆洛（Edward R. Murrow）爲USIA的負責人。

這項任命是希望藉著穆洛的專業背景——他曾任多年CBS特派員——導致VOA的權責及預算有所增加，同時在報導上有更深入審慎的作業。

在穆洛任期內，VOA的發射電力有了顯著的改進，如一九六三年二月北卡羅萊州成立一座

有 4800 KW 的發射基地，稍後又在賴比瑞亞（Liberia）建立一座永久性發射站。這使 VOA 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播更形清晰，效果增強許多。

一九六二年，VOA 開始一項在當時仍屬革命性的節目型態：早餐時間（The Breakfast Show），一個全球英語廣播節目，每次播出二小時，內容包含流行和半古典音樂（主要為美國的），同時也有新聞報導、專訪、特寫等內容。

起初，沒有人能確保這項作法是否成功，但隨著調查和聽眾來信的熱烈反應，很快的，「早餐時間」便成爲廣受好評的節目，擁有廣大聽眾。

另一方面，以強硬態度攻擊共產主義的廣播已經取消；特別的英語新聞報導，每分鐘以九十個字的速度播出，通常限定在一千二百字範圍以內。同時，配合甘迺迪總統渴望表達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切，許多新的語言節目，特別非洲方面，也紛紛開始播出。

穆洛和大多數 USIA 的負責人同樣面臨一項無法克服的困難：能夠在政府高階層的政策上，提供有意義的影響。例如，他曾試圖喚起國家安全會議的委員（他本人也是委員之一），重視一九六一年入侵古巴（豬灣 the “Bay of Pigs”）行動廣播在心理方面所能產生的影響。可是他並沒有被給予一個說服其他委員的機會。

從豬灣事件後，VOA 的工作人員敏感的發覺到政府的干預已日趨增加。一位工作人員便曾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政策接管一切，而客觀與信譽被拋之一旁」。

## 第五節 客觀報導的奮鬥

穆洛於一九六四年二月辭職，VOA 內部呈現不穩情形。報紙披露數件有關 USIA 的「檢查」特別報導，包括新聞總署不滿 VOA 報導黑人分離主義領袖麥康 X (Malcolm X) 的死訊，雖然這項報導相當客觀而且廣受好評。

亨利·魯米斯，曾任 VOA 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負責人，在他的告別演說中，提到美國之音是如何面對壓力，和如何努力的仍維持客觀報導，特別是當政府要求作短期政策性的廣播時，客觀報導的奮鬥更成爲一項艱鉅的工作。

由於在客觀報導上的諸多衝突，詹森 (Lyndon Johnson) 總統特別選擇 NBC 的約翰·張士樂 (John Chancellor) 執掌 VOA，並保證他可以有「報導有利和不利新聞的自由」。

一九六五年九月，張士樂正式成爲 VOA 負責人。在其任期未滿二年時，便辭職返回 NBC。他曾於隨後發表聲明，對美國之音在報導上的客觀程度表示滿意。但是根據李察·華頓 (Richard Walton) (曾在張士樂手下工作過的一位 VOA 人員) 表示張士樂根本未能實際瞭解真相，許多違反客觀報導原則的事件，在還沒有送到他的辦公桌之前，便付諸報導。

張士樂的繼任者，約翰·達利 (John Daly) (曾擔任 ABC 多年新聞人員)，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就職。此時，國會正針對 VOA 所界定的客觀報導成就進行質詢，認爲達利的工作主要在

促進全民的思想，而非報導反對政策的聲明。

達利因此展開一項為期六週的海外訪問，以期瞭解VOA在聽衆心目中的印象究竟爲何。

可是當他結束訪問歸來，却發覺USIA負責人隆那·馬克(Leonard Mark)處心積慮想將VOA的全球英語廣播部門併入USIA中，以便美國之音能更直接處於新聞總署的管理之下。達利遂於一九六八年六月辭職，因爲他感覺處於一個只顧自我利益的決策者手中，是無法真正有效的爲新聞事業來服務。

## 第六節 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

當尼克森政府決定自越南撤軍時，VOA所面臨要求試圖緩和各方抨擊美國在越南行動的壓力也隨之消退，但並未完全平息。一九七五年，美國自西貢撤離的最後時刻到來，VOA被要求停止報導這項最後撤退行動，原因是美國駐越南大使葛拉漢·馬丁(Graham Martin)恐怕如果事情一經報導，將會導致越南人民更大的恐慌。可是VOA的工作人員指出最終世界各主要電台都會報導這項撤退行動，而VOA則會因其保持緘默而特別引人注目。

不幸的是，這項辯解不受重視，美國之音的信譽再次遭受嚴重打擊。

然而，VOA有關水門事件的報導所得到的評價則普獲讚賞，大多數新聞界人士形容爲深入明瞭，不偏不倚及分析仔細的好報導。這項成就提醒了批評者和VOA的成員，美國之音也曾爲

其信譽打過美好的一仗。

水門事件和越戰似乎證實了一些VOA成員早已有的體認：VOA對於國內事物發展作客觀報導的自由，遠大於報導美國外交政策。而國務院對VOA的壓力，仍不斷持續著。

一九七六年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強烈批評VOA的記者訪問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成員的作法。依據他的說法是，VOA記者是美國大使團隊中的一員，既然美國與PLO並無正式外交關係，訪問PLO成員是件極不恰當的行為。

這項事實顯示了長久存在的一個問題：對VOA的記者而言，究竟在什麼情形下，他們代表了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而究竟又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們則被視同美國政府的發言人？

VOA的憲章指出，儘可能完整而真實的反映出美國人民的生活，是VOA的責任和義務。但另一方面，憲章又規定它同時要成爲美國政府對外發表聲明和看法的一個管道。這種雙重的任務，形成許多問題的根源，並成爲VOA中只佔少數比例的新聞人員的一大難題。

爲了解決這項難題，VOA負責人彼得·史特勞斯（R. Peter Straus, 1977-1979）召集一個由新聞界人士卡麥爾·羅勃特（Chalmers Roberts）主持的審查會議，以研究VOA的國外特派員的權責問題。

一九七八年，該審查會提出報告，主張這些記者應和海外政府部門完全脫離關係，以便他們得以和其它駐外特派員享有同等權利，遭受相同限制，並且不具備外交人員的豁免權。

這份報告對VOA而言，有其迫切性：例如，當VOA的記者採訪尼加拉瓜衝突（1979-1980

年)時，便可自由的會晤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即使後者並不為美國政府所承認。

一九七三年，一個由私人贊助的委員會——墨非委員會 (the Murphy Commission) 也開始審慎的研究這些問題。一九七五年，委員會得出的結論建議VOA應成爲一個獨立的聯邦機構。同時，另一個私人贊助團體——史坦頓審議會 (the Stanton Panel) 也提出同樣的看法。

雖然這許多聽證會都支持VOA的分離獨立，但是由於國會及政府仍視其爲「冷戰中的宣傳利器」，因此在其後三年的國會辯論中，VOA仍成爲已取代USIA名稱的「美國國際交流總署」(U.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USICA)的一部份。國會似乎無法正視一個「獨立」的VOA。(按：USICA已於一九八三年一月恢復USIA之名稱)

一九七〇年代中晚期，VOA的一個特色便是由於國際局勢的緊張，大量的廣播主要都針對著蘇俄。可是這些廣播常因當事者立場及事件、時間的不同，或是被指控爲太「軟弱」，或是被指控爲太「強硬」。

蘇聯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停止對VOA中俄語節目的干擾(可是由於波蘭事件，一九八〇年八月重行干擾)，並以此爲由大肆批評美國之音，過份報導蘇俄境內抗議共產暴政人士的事件。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人權鬥士和俄籍猶太人則批評美國之音，對蘇俄的廣播太過軟弱，似乎有意向蘇俄示好。

在過去三十年間，VOA的對俄廣播節目常一再成爲被評價的主要項目。

事實上，VOA的其他廣播節目有許多是針對世界上另外的地區，另外的主題和事件所製作

的。美國文化仍是節目重心，但其他國家的文化也受到重視。

對於VOA和全球多數主要國際電台而言，一九七〇年代是一個穩定成長的時期，廣播時數和語言數目都沒有太大的變動。

一九七〇年時，VOA平均每週以三十五種語言播出八百六十小時節目；直至一九八一年十月，這二項數目也仍是三十九種語言與九百〇四小時而已。當然，略為變動是難免的，如隨著越南淪陷，對東南亞的廣播減少，對日本廣播也於一九七〇年取銷，對烏茲別克（Uzbek）廣播則於一九七五年開始。有些舊的發射站，被更新且更具威力的發射站所取代。衛星廣播也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被普遍使用。

由於蘇俄入侵阿富汗，VOA在布里斯辛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強大壓力下，積極擴展對波斯灣地區和中亞人民的廣播。雷根政府的堅定反共立場，也導致VOA在一九八一年時，對蘇俄廣播的六種語言節目每天增加四個小時。同時，一項特別針對古巴的廣播也可能於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度展開。

## 第七節 節目內容

英語，無疑的是VOA語言節目中的重心——每天以二十四小時向全球播出，另外加上一些每天的特別節目，分別對非洲（五·五小時）、拉丁美洲（一小時）和加勒比海地區（三十分鐘）

提供額外服務。

其它的語言節目包含了全球各主要語言（日語是少數例外）和許多較爲次要的語言，而特別著重於東歐和蘇聯方面。

新聞和資訊內容形成了VOA節目中的主體，佔所有播出時數的三分之二比例以上，相當受到重視。這些新聞報導資料，大多由VOA的中央新聞室所供給。而中央新聞室的消息來源，又可能得自各種不同的途徑，如通訊社、國內廣播電台、報章雜誌和特派員等方面。新聞的翻譯力求完整、正確。可是由於需要翻譯成多種語言，而且新聞有其時間性的限制，因此錯誤是在所難免的。

VOA常以其新聞報導的完整和適時而感到自豪，有時VOA的全球英語廣播網會同時播出由其十五位駐外特派員輪流報導長達一小時的新聞節目。但是在有關俄語廣播部份，有研究顯示其報導的適時性仍遜於BBC、德國之音等西方競爭友台。

也有研究指出，由中央新聞室提供的新聞題材，對某些語言的節目內容而言，顯得過份偏頗獨斷。根據VOA本身內部的批評認爲：中央新聞室太過於強調美國國內事務的報導，而這些報導並不見得會爲海外聽衆感到興趣。

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大多數新聞室的成員都曾在國內報社或廣播電台服務過，而許多語言部門的成員，則是在他所播報的國家裏出生成長，因此二者間不免對於那些報導適宜節目內容，有了觀念上的差距和爭執。

VOA的評論是其許多新聞和資訊廣播節目中，最爲特殊且引人議論的一項。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這些評論無一不代表美國官方的意見，而評論在播出前也都要經USICA政策官員先行檢查過。

大多數VOA成員打從心底厭惡這種作法，因爲評論並非每天固定播出節目，聽衆並不會有特定收聽習慣，所以其成效如何值得懷疑。同時，評論以一種官方聲明方式播出，也不啻提醒聽衆VOA是一個美國宣傳機構，使其客觀的形象大打折扣。

VOA也播出大量「軟性」資訊（屬於較不受時間限制或較不尖銳的事件）。這些資訊內容包含有：音樂點播節目、聽衆信箱、英語教學、古典音樂、書籍評介、文化歷史、宗教福音、科學發展和新的工業產品等項目，可謂包羅萬象，無奇不有。

在VOA工作人員心目中來看，這些軟性資訊不僅可以吸引聽衆更進一步收聽所謂的「硬性」節目，同時還可以在聽衆心目中塑造一幅較屬個人性、親切性的美國形象，而非僅視美國爲一毫無相干的政治體系。爲了要加強這種功效，軟性資訊節目通常都以一種輕鬆活潑，不拘形式的型態播出。

## 第八節 聽 衆

VOA沒有自己的研究部門，一方面是由於USICA本身已有專門的研究機構——研究室，所

以無需重覆設置。另一方面，USICA有關廣播的研究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中幾乎完全停止，這是因爲當時負責人，約翰·阮哈特（John Reinhardt）不重視這些研究所致。這種情形，直到阮哈特在一九八一年底辭職才獲改善。

由幾個不同的研究（可參考第十一章）中顯示，VOA的聽衆群像大體和其它主要國際廣播電台的聽衆一樣：中等年齡、事業成功、受過良好教育、居住都市。許多都是所謂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如政府官員、工商主管、教師，有時甚至是軍界和宗教界的領導人物。

聽衆的多寡，各國不同。那些本國電台已有完好體系，而且報導又享有充分自由的國家，收聽國際廣播的人口必定最少（如西歐，僅有百分之二）三比例的人，每週收聽一次或一次以上的VOA廣播）。但是那些國內缺乏足夠的廣播服務，特別是缺乏一個可信賴的廣播媒體時，則聽衆人數可能佔最大比例（如非洲一些地區，VOA的聽衆可高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十）。

研究也顯示VOA受聽衆信賴程度相當的高，通常緊跟BBC之後，爲第二高可信賴的廣播電台。而且有些時候甚至會凌駕BBC的聲譽之上。

至於聽衆所喜愛的節目內容，則以新聞性節目最受歡迎，其次爲音樂性節目，爲特殊聽衆播出的節目，自然敬陪末座。

想要估計VOA在全球所擁有的聽衆數目相當困難（據VOA的推測，在一九八一年每天約有八千萬的聽衆收聽其節目，這還不包括中國大陸），這數目約略和BBC相等。

VOA曾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晚期舉行過數次的聽眾調查，詳細情形將於第十一章中再加敘述。

## 第九節 科技服務

二次大戰時期，美國所致力的是發展國內發射站的威力，使能達到大部份的目標聽眾。但是隨著全球性國際廣播活動的增加，和美國試圖能使其廣播網遍及全球，終於導致在世界各個角落設立發射站的步驟。

拜二次大戰勝利所賜，美國這項行動進展得很順利，佔領區的西德和琉球（Okinawa）毫無問題的設立發射站。另外法國、菲律賓、英國、希臘、錫蘭、泰國、摩洛哥和賴比瑞亞等國，也都紛紛應允美國設置發射站的請求。除琉球於一九七八年因歸還日本而失去外，其餘至一九八一年還仍繼續運作著。

由於海外發射站必須給付經費予當地政府，因此經費的支出是一筆龐大的數目，成爲VOA相當沈重的負擔。同時，因爲發射站位居別國，掌握不易，因此有時不得不冒發射站被當地政府所利用，甚至作爲反對美國政策工具的風險。一九七〇年代初，希臘便曾有過這樣一次事例。

雖然有這些顧慮和不便，可是另一方面，海外發射站却也帶給VOA很大的利益，使它的廣播能透過強大的電波，清晰的傳送到聽眾家中。在這些發射站中，有的是以中波播出，由於中波

聽衆人數遠勝於短波，而且又較不易受到干擾，遂使得VOA的廣播範圍更形擴大，增加不少聽衆。此外，經由當地電台轉播VOA節目或播放由VOA灌製的錄音節目，也使得更多人成爲VOA的熱愛者。

在美國本土也有幾座具有強大電力的發射站，它們和散居世界各個角落的發射站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全球廣播網，威力無窮。可是在蘇聯、中東、南亞和非洲等地，VOA的訊息則遭遇極大的干擾和困難。至今非洲東部和南部大部份地區，仍然很難收聽到VOA的廣播。

一九七九年，VOA開始透過衛星來和海外發射站聯繫，可是如果要作到將廣播直接傳送到聽衆家中的理想，仍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需要努力。

總之，不管究竟是利是弊，VOA是愈來愈依賴其海外發射站了。

## 第十節 未來展望

在新的一九八〇年代中，VOA面臨的是一連串潛伏的問題和機會。

就如前面我們曾提到廣播涵蓋範圍的不足，便有賴建立更多威力更大的發射站，來彌補這些弱點。可是這其中也涉及國會是否願意增加撥款，和發射站所在國政府是否准許擴充現有的設備等問題，並非能夠一蹴即成。

此外，只要美國仍在這動盪不安的世局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VOA的言行便必須能關切

世上其他國家的利益。對開發中國家而言，他們所最關切的便是如何使他們的呼籲得到重視，並使現今不平衡的資訊流通得以改善。VOA以往由於過份強調美國本身或是美蘇關係，因此疏忽了這方面的報導，這將是今後所必須努力的重點。

VOA可能在未來仍需面對可信度的問題，來自國會和國務院的壓力依舊時時不斷。最主要關鍵是由於USICA和VOA僅屬於政府部門中的次級單位，是無法抗拒這些外來權力的。然而，如何求取報導的客觀可信，仍是每一位VOA成員所應全力以赴的目標。

VOA的語言服務仍嫌不足，特別在印度和非洲方面，許多聽眾無法收聽到VOA以他們本國語言所播出的節目。可是，似乎VOA並無意再增加任何新的語言節目。

當VOA即將邁入其第五個十年度裡，已無人會再懷疑其存在的價值了。儘管國會和一些政府官員仍以「對抗共產主義」為他們的評估重點，VOA已逐漸平衡它的節目重心，對共黨國家和非共黨國家給予相等的廣播時數。

同時，許多節目也不再關係到美、蘇對抗問題，而是有關音樂、科學、體育和其它國內外大事的報導。節目的生動活潑，個人特質的吸引，使得美國在許多聽眾心目中仍維持著親切的形象。

如果VOA能繼續在超強發射電波競賽中保持優勢，避免類似西貢撤退報導例子中的可信度問題，平衡有關美蘇關係和其它國家的報導，那麼它將可以在國際廣播舞台上愈來愈受到更多聽眾的喜愛。

可是，或許VOA在未來的成功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如前VOA的工作人員弗烈德·柯林（Fred Collins）所指出：

廣播最適宜的目的乃在傳播新聞，而非試圖改變人心。對於那些只是懂得要求VOA，無論在戰時或平時都要遵循外交政策的人而言，他們常忽略了一個簡單的關鍵，那就是聽眾有權作最後的決定。他——或她——總是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收聽的。